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學位論文

中國官方與學界對中、美雙方是否會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之看法

**How d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Academics View the
“Sino-US Thucydides Trap” Argument?**

指導教授：薛 健 吾 博士

研究生：黃 詩 瑋 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摘要

本論文的研究內容將針對「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如何看待中美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認為如何破解之方法進行深入的分析及探討，並試圖比較「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在觀點上的異同及關聯性，歸納出中國實行當前戰略的意涵、中國未來可能採取的外交策略及其對外所欲展示之訊息和潛在意圖。本論文發現，「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對於中美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個別的看法上雖然有些許的差異，但是基本的大方向是相同的，大致上是以「中國官方」的觀點作為主架構，「中國學界」再以此做進一步的分析及闡述，他們在這些看法的共同觀點，包括均主張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是有辦法破解的、中美關係發展的新思維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認為與美國正面衝突非有利於中國長期之國家利益、維持中國經濟的高度成長才是未來能否與美國抗衡之關鍵等，而其中他們的個別看法上也部分差異，例如有些學者認為中美已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關係在本質上是相互抗衡的；中美關係比過去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更複雜；「價值觀衝突」及「權力競爭」讓中美陷入混亂），有些學者則不這麼認為（中美雙方領導層仍有聯繫；如果美國不再感到恐懼，也沒有侵略性行動，修昔底德陷阱將不復存在）等，但一般來說，「中國學界」相較於「中國官方」，是處於政策的實際執行層面，因此比較會對於中國當局未來可能實施的政策走向有更多詳細的解釋及建議的執行方式，並對中國當局的正在進行的戰略做深入分析及闡述。中美關係影響當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甚鉅，關注中國國內對於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態度期能在日後有助於降低中美間因彼此戰略誤判所引發的衝突及減少世界發生動盪的潛在機會。

關鍵字：中國官方、中國學界、修昔底德陷阱、攻勢現實主義、權力轉移理論、中美關係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8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3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14
第二章 理論基礎.....	17
第一節 權力平衡理論.....	17
第二節 權力轉移理論.....	20
第三節 修昔底德陷阱.....	25
第四節 攻勢現實主義.....	33
第五節 小結.....	40
第三章 「中國官方」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	43
第一節 中國當代領導人的觀點.....	44
第二節 中國外交部及其他官方部門的觀點.....	54
第三節 「中國官方」觀點的特性.....	58
第四節 小結.....	62
第四章 「中國學界」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	65
第一節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王緝思的觀點.....	66
第二節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閻學通的觀點.....	75
第三節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金燦榮的觀點.....	80

第四節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袁鵬的觀點.....	85
第五節 小結.....	89
第五章 結論.....	96
第一節 「中國官方」與「中國學界」在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各個面向 之態度有何異同？.....	96
第二節 研究發現.....	99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與中美的未來展望.....	101
參考文獻.....	103



表次

表 2-1 「權力平衡理論」中權力對比與發生戰爭的機率	40
表 2-2 「權力轉移理論」中權力對比與發生戰爭的機率	40
表 2-3 「修昔底德陷阱」中權力對比與發生戰爭的機率	41
表 2-4 「攻勢現實主義」中國際體系結構與發生戰爭的機率	41
表 2-5 「攻勢現實主義」中相對權力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	41
表 4-1 「中國學界」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個別看法、相同與不同之處	94
表 5-1 「中國官方」與「中國學界」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相同與不同之處 ...	9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作為中國當代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曾分別在 2014 年及 2015 年兩次公開提到「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¹ 他提到「中國沒有追求霸權的基因」並對「國強必霸」的觀點提出批評(郭俊奎，2014 年)，主張「世界上本來就沒有修昔底德陷阱，然而大國間戰略的反覆誤判，則可能會為自身製造陷阱。」，以及對於新型中美合作關係未來走向的見解(紐約時報，2015)，都引起世界各國研究國際關係議題學者的廣泛研究及論述。「修昔底德陷阱」出自 2,500 年以前描述在雅典和斯巴達雙方的因競爭而引發的戰爭中，由當時的學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提出的論述：「不可避免的戰爭的因素，乃雅典日漸強大的力量，以及因為擔憂這樣的力量而於斯巴達心中所形成之恐懼。」而修昔底德陷阱被解釋為：「在既有的霸權與崛起的國家相互競爭的時候，戰爭將因為這些挑戰而被引發。」在這種描述危險歷史的模型中，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貝爾福科學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前主任 Graham Allison 在其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提到，回顧過去五百年的記錄，十六個崛起大國挑戰舊有強權地位的例子中，有 12 例以戰爭告終，只有 4 例沒有。對於 21 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競爭而言，這確實不是一個令人放心的數字(Allison 著，包淳亮譯，2020 年，頁 11-12)。

(一)國際間權力均勢的變化

¹ 習近平兩次公開提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分別在 2014 年 3 月 27 日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會上及 2015 年 9 月 22 日參加美國友好團體與華盛頓地方政府共同舉辦的歡迎宴會上之演講。

在超過 2,500 年以前，在當時雅典的學者修昔底德提出一項有力之見解：「斯巴達因為雅典崛起所形成的恐懼，從而導致戰爭無法避免。」其他人指出造成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一系列原因，但修昔底德認為這個問題重點在兩個競爭對手之間權力平衡的迅速變化所造成不可避免的結構性壓力 (Allison, 2015)。

從 1990 年代開始，美國所展現出的相對影響力在眾多的議題當中快速的削減，就經濟實力而言，美國相較於日本及中國，都逐步地呈現衰退。在軍事能力上，美國與其他地區的新興崛起大國(如中國、伊朗及印度)之間的實力轉變，也逐漸從深入核心地區退縮到邊界地帶。美國原本許多絕對性的優勢力量及軟實力等國際影響力也開始轉移到的其他國家及跨國性企業的角色中 (Friedberg, 1994, pp. 20-21)。

時至今日，西方國家的傳統軍事武力仍舊是領先著全世界，但能否持續保持優勢沒辦法確認，然而可以理解到的是如此的軍事規模是其他非西方國家在短時間內無法趕上的。然而全世界的軍事安全，已經漸漸地從仰賴全球的強權國家的權力分配及作為，轉變為各區域不同文明間主要國家的權力平衡來取代。西方國家在 21 世紀不論是科技、發明及科學研究上的能力及創新仍具有相當的優勢，這也使西方從最顛峰的 1920 年代起至今仍能持續保持為世界最強大的文明，但對於其他權力一點一滴地流失轉向其他非西方國家文明卻開始顯得力不從心、無能為力。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隨著冷戰結束，蘇聯的共產主義瓦解，西方國家更加確信自身文化就是帶領世界走向繁榮的根本，以散播自由民主的理念為己任，認為世界所有國家都應如此才能擁抱和平欣欣向榮，非西方國家都應該接受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資本主義的市場、權力分立的政府、重視人權及法治的社會等，有意將西方文化塑造成普世文化，然而僅部分非西方國家認同這些理念，對於其他大部分非西方國家而言，西方普世論，就是帝國主義。西方國家利用這些理念來打造對自己

有利的國際體系及制度，藉以維持自身的優勢；也由於這些理念打壓了其他非西方國家對於自身本土文化的認同而產生對立，隨著西方國家相對權力的衰弱，非西方國家的勢力漸長，西方在對世界的經濟、軍事及文化上面的控制已不若以往(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2020 年，頁 246-248)。

(二) 中國的崛起

受到鄧小平的影響，中國過去一直以來都保持著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避免外界論及有關其本身的崛起，一直到 2003 年 11 月時任中國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兼任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主任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的演講題目「亞洲的未來與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發表了關於中國「和平崛起」專題演講(新華網，2003)，「中國的和平崛起」一詞才正式映入世人眼簾。在同年 12 月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中邀請了溫家寶演講，他說道：「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香港文匯報，2003)。胡錦濤也在當月在中共中央 110 周年毛澤東誕辰紀念會上的發言中，提到：「堅決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就是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新華社，2009)。自此以後，中國的「和平崛起」論，也被視為當時的黨的指導路線及中國國家發展戰略。中國的「崛起」也因此受到世界更多的關注，再加上學者 Ross H. Munro 在 1992 年的文章中〈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Awak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就已經提到未來亞洲的霸權可能就是中國，且會開始漸漸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 (Munro,1992, pp. 10-16) 及 Sa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也認為在後冷戰時期衝突主要是由文化的差異及宗教的不同所引起，而中國為首的儒家思想文明及伊斯蘭文化國家有聯手推翻西方文明的可能(Huntington,1993, pp. 22-49)。有關「中國威脅論」觀點的言論更是在當時漫天飛揚。作為回應，「中國官方」也開始對「和平崛起」一詞開始閉口不談，於 2004 年後改稱為「和平發展」，並在 2011 年 9 月以及

2005年12月共發表了兩份白皮書分別是《中國的和平發展》及《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架構與「和平崛起」大致相同，除了和平崛起的根本理念外，說明了和平發展道路的做法、背景及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2011)，然而不論是中國將「和平崛起」或者是「和平發展」作為其戰略目標，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無法忽視的存在。

自冷戰結束後，世界的舞台已經逐漸轉向亞洲。亞洲，隨著東亞經濟實力的提升，是二十世紀至今最具有發展力的一個區域，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作為亞洲國家之中國經濟成長突飛猛進的攀升，中國GDP國內生產總額在2003年超越英國及法國、2007年超越德國、2010年超過了日本變成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謝金河，2010)，如此經濟成長速度，也為未來的中美衝突埋下了不安的因子。在過去，經濟的擴展往往使各民族間更加的熟悉彼此，但也更加的畏懼彼此；頻繁的貿易交流不僅是促進了合作卻也產生了磨擦和衝突。在悠久的歷史洪流中，中國長期以來幾乎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如今這個歷史可能將再次顯現。

美國國防部前部長 Joseph S. Nye, Jr. 曾說：「硬實力係指只通過軍事力量及經濟手段迫使他國接受的能力；而軟實力則是藉由文化、意識形態及價值觀上的影響力來達成其所想要目的的能力。一個國家的文化、意識形態或價值觀非常有吸引力，就會使得其他國家容易去效法學習，並接受他的支配。」(Nye, 1990, pp. 181-182)，如果有堅強的硬實力作為根底，那麼軟實力的效果將會擴大。是以，隨著非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及軍事力量的崛起，對於自身本土的文化認同、價值觀等軟實力跟著提升，對自我產生肯定提升自信心，進而增加對他國人民的吸引力，同時也會對外宣傳自身文化的優勢。非西方的文明崛起，隨著權力的增加，與其文化相輔相成，權力的擴及範圍也是文化的所到之處。亞洲對於自身文化的自我肯定，形成亞洲各地的「文化復興」，不再像過去認為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任何東西都是最優秀的(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

2020年，頁142-143)，它強調每個亞洲國家自身的文化特色及其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地方。與過去西方文化的模式相同，強勢的文化將會變成世界性的文化，伴隨著亞洲的自信心日益增加，亞洲文化邁向世界性的亞洲文化。物質的成就讓文化得以伸張，強勢的權力造就了軟性的吸引力。亞洲國家在權力日漸強大的情況下，將會加強對於國際政治參與及權力重新分配，企圖塑造一套有別於西方國家的準則，重新訂定國際標準及領導世界趨勢；這也會對一直以來由西方所主導世界秩序造成衝擊，中國的崛起，將引發各文明間的權力關係的動盪，衝突也將變得越發不可避免。

(三) 歷史上最大的玩家

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地緣戰略不是暴力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或復興的俄羅斯，是中國的崛起，讓以美國為首之國際秩序產生重大的衝擊。正如新加坡已故領導人李光耀所言，中國對於這個世界平衡所造成的影響過大以至於世界必須重新找到新的平衡，在歷史上從未有一個國家在眾多的權力層面上如此迅速的崛起，我們不能假裝中國只是另一個大玩家，它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玩家(Allison, 2015)。

在2014年1月22日於達沃斯所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發表了美國《赫芬頓郵報》的《世界郵報》子報創刊號，在此次對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專訪中提到，關於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必將面臨與舊有霸權國家引發對抗之疑慮，習近平提到，我們都應盡量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認為「強大的國家必定追求霸權這一論點不適用於中國」、「回看我們過去長遠的文化背景和歷史，這不是中國文化的基礎。」他還提到了古希臘雅典和斯巴達的過去的戰役：「我們必須團結起來避開修昔底德陷阱，這是存在於發達國家及發達國家中或發達國家及新興國家中的破壞性緊張局勢。」(王楊、張苗鳳，2014)。隨後，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應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 的邀請

參加華盛頓州地方政府和美國友誼團體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他還提到：「如何重新開始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首先，正確判斷彼此的戰略意圖...世界上本來就無『修昔底德陷阱』，然而於大國彼此間之戰略若不斷重複產生錯誤判斷，則有很大機會為自身創造一個『修昔底德陷阱』。」(紐約時報，2015)。

在 2012 年 11 月 15 日中國共產黨第 18 屆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中，選出習近平擔任新一屆的中央軍委會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在會議結束沒多久後，習近平在一次「復興之路」之展覽中發表「中國夢」的言論，說道：「如今大家都在談論中國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都有追求和理想。我認為，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自那時候開始，「中國夢」便成了國際上高度矚目的焦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

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在國際世界中被迫需就其扮演的角色進行重新定位，包括其在對外形容自身立場的方式、海外華僑參與中國經濟的規模、以中國為首的華人社會間的政經關係和外交手段，以及提升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向心力等。在習近平時期中國持續朝著兩個目標邁進，一是提倡中華文化並推廣至全世界華人社會；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在進入 21 世紀後，西方各國不論是在軍事上或者是在國際影響力上相比其他非西方國家依舊是穩占上風，但各文明間的權力平衡已經被打破，權力的板塊開始產生變化，西方國家的勢力逐漸衰退，一旦西方國家失去世界龍頭的地位，部分權力將轉移到其他非西方文明國家，而伴隨著的亞洲文明崛起，中國的經濟成長勢不可擋，對於其自身文化的認同越發深化，強調他們文化的優勢及特色，也更加抗拒西方國家欲加諸他們身上的壓力、文化及價值觀，這也將挑戰著世界上西方國家既有霸權的統治地位。

二、研究目的

伴隨著中國近年來的迅速崛起，在經濟、軍事與外交領域中國皆取得了長足發展，並逐漸引起了既有霸權國家的關注。過去，由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倡導的「華盛頓共識」，² 出現了一個新的強大競爭對手「北京共識」，³ 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開始將注意力轉向中國主導的這種新的發展模式。鑑於近年來中美之間的互動日益僵化，包括中美貿易戰的風險、香港的國家安全法、美國對華為的抵制以及南海主權爭端日趨加劇。當新興崛起大國是否將挑戰既有霸權國家，或者既有霸權國家是否會主動挑戰新興崛起大國，從而導致戰爭不可避免，隨著事件的不斷發展和演變，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關係學者對中美是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發展更多的討論和研究。在中國國內也是如此，中國政府當局，甚至是中國當代領導人習近平都討論過修昔底德陷阱，他們都有各自的觀點、見解及相關政策方針，一如中美關係日益緊張之際，2010年5月時任國務委員的戴秉國在中美經濟與戰略的第二輪談話中，提到了一種新構想，即「新型大國關係」(孫揚，2013)。2012年2月，當時作為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問美國，主張於中美間建構新型大國關係。他提到，「中美雙邊關係是處於新的歷史出發點上，應盡力將雙邊夥伴合作關係塑造為21世紀之新型大國關係」(孫揚，2013)。「中國官方」在執行政策前通常會對外進行宣示，以作為其國家政策的基本方針、原則及目標，是故「中國官方」對中美關係的論調攸關其未來的政策執行。

「中國學界」也有自己的論述，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金燦榮認為，中美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非常有創意，對於習近平所提出「不

²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是在1989年所產生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是指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國際組織來推動拉丁美洲及東歐等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改革。

³ 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為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由中國所發展出的一套經濟與政治模式。開發中國家藉由效法中國經驗所衍生出尋求經濟成長及社會轉型的發展模式，供其他想要融入國際社會且欲保留自身獨立的生活方式及政治體制之國家的參考。

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些面向之意義很確切，其中重要的是執行至實際政策上，仍然有一些障礙。美國則沒有否認或欣然接受這種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美國人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抱持更加清晰之態度，即不是強調原則和框架而是發展實際的合作，「新型大國關係非由言語來定義而是應該通過行動」（金燦榮，2015）。在中國研究國際關係領域具有權威的中國學者對於中國的政策有一定的影響力，再加上其論述會被中國官方媒體所報導及推播，所以研究「中國學界」之於中美彼此間的修昔底德陷阱看法格外重要。

面對未來的不可預測性，如同使用國際關係理論來分析國際情勢一般，企圖運用各種理論來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希望盡可能避免我們所不想要發生的事情又或者減少這些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因為在過去對於中美彼此間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很多不一樣看法，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

- (一)彙整各個看法對於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態度是樂觀或者是悲觀，並比較「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在觀點上的相同與不同之處分別進行分析。
- (二)在統整出「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對於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各自相同與不同的態度後，評估中國對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看法，最後歸納出中國在未來可能採取的外交戰略以及其所要對美國及全世界表達的意圖。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方法

一、研究問題

強權國家間的衝突可能因為權力均勢的改變而發生，在古希臘時期學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即提到是當時新興強權國家雅典的崛起，造成既有強權國家斯巴達心中無法抹滅的恐懼，導致戰爭無法避免，進而演變成希臘文明史上的

伯羅奔尼撒戰爭。正在成長茁壯的新興強權與日漸衰弱的既有強權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一部份取決於既有霸權在面對新興強權的這些轉變所採取的措施與態度，另一部份視在既有霸權統治下新興強權試圖挑戰以改變現狀的企圖心，中國的崛起可能是當今世界強權國家發生跨文化戰爭的導火線，伴隨著經濟的成長，亞洲的國家軍事預算逐年增加，再加上亞洲各區域間可能發生衝突的引爆點很多，包括台海危機、南海爭奪、南北韓及中印邊境衝突等，若這些區域不慎擦槍走火，都有可能爆發全面性的戰爭。這也如 Aron Friedberg 形容：「過去的歐洲可能就是亞洲的未來」(Friedberg, 1993, pp. 20-21)。

筆者嘗試從新興崛起大國的學者自身角度看待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比較它與中國政府的政策或觀點是否相同，甚至是比較與西方既有霸權國家學者之間看法的差異，從新興崛起大國本身的角度討論問題，以推斷該國學界和政府政策的相關性，並了解新興崛起大國未來可能的政策發展以及面對突發危機可能採取的行動和抱持的態度，從而評估因為相互懷疑導致將來在新興崛起大國與既有霸權國家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綜上所述，本文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 (一)「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認為中美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 (二)「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認為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 (三)「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有何異同？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探討「中國官方及學界」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看法之研究，包括「中國官方及學界」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解讀、認為中美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避開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解決之道。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文獻的蒐集、整理和評估。

(一)案例選擇方法

有關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述係古希臘學者修昔底德探討斯巴達及雅典之間的戰爭衍生而出，時至今日隨著中美關係日益緊張，各方學者針對中美雙方間修昔底德陷阱問題之探討也越加廣泛，本文將研究對象聚焦在「中國官方及學界」對於修昔底德陷阱之不同看法。

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官方」本身就是中國的政策執行者，因中國雖對於自身在國際上的定位發表過許多的言論，惟在用詞上略顯含糊且有所保留，較難判斷其實際的目的，因此筆者希望能從「中國官方」的言論等深入研究，包括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等、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副部長樂玉成及中國官方其他部門官員等，一窺中國在國際上的戰略思維及潛藏的意圖。

另一方面，透過在中國具有權威性的學者，筆者針對中國國內知名學校中的國際關係學院在中國國內排名前幾名且在研究國際關係領域具代表性學校的學者，包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王緝思、「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閻學通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金燦榮，再加上中國國內最重要的智庫之一，即「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CIR)內的學者袁鵬等，挑選的理由是基於上述這些知名學者於其所處的各該學校及研究機構之國際關係領域內都是最有威望的代表性學術鉅子，不僅如此，他們對於中國政策會有一定的影響，論述會被官方的媒體所報導，有相當大的能見度以及極高的民間影響力。而其中「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亦是當前中國國內研究綜合性國際問題領域的最重要研究機構，為中國國家安全部所直屬的機構，並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所領導，為當前中國政府於進行外交決策時提供重要國際領域的專業意見，是目前中國國內智庫中排名第一位的智庫，在 2021 年「智庫研究項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TTCSP)的評估報告《2020 全球智庫報告》(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全球百大智庫中

排名第 18 名(McGann, 2021)，不論是在學術界或官方對於中國的國際外交政策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藉此深入分析「中國官方及學界」的看法與中國外交政策的關聯性，選擇該兩者進行研究，探討中國內部對於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之不同看法，提供有別於其他國家學者的論點。

(二)資料蒐集方法

透過多種的來源資料來組成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或正在進行的事件，本文蒐集資料方式的來源有二：—

1. 「中國官方」代表性官員論述及看法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蒐集與「中美間是否會發生修昔底德陷阱」相關之文章、學術期刊、出版書籍、論文、網路資訊、相關國家的官方文件及出版品、官方論述、研究報告並結合實際發展現況、即時的新聞媒體報導及評論、相關國家現正採取的措施等資訊，並特別著重在「中國官方及學界」的資料蒐集，將所得到的資料加以過濾、釐清、統整及整理後，針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及探討，以運用在本文各章節中作為有效的基礎及客觀的立論。

透過中國的外交文件資料，或媒體報章、學者著作及期刊評論等的內容分析，可適當的推斷中國面對中美之間外交關係現狀的看法，例如檢視中美貿易戰前後「中國官方及學界」對於貿易戰的態度，探討「中國官方及學界」的論述與日漸產生摩擦的中美關係的關聯性等。另外，筆者也針對中國代表性政治人物的言談、中美外交政策、國際事件處理等，包括「中國官方」代表性官員在各種場合的講話或發言，一如胡錦濤從一開始中國的「和平崛起」演變為「和平發展」、習近平的「中國夢」、他在 2013 年 6 月與歐巴馬的會晤中，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涵義作出解釋：「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裴

敏欣，2013)及在 2014、2015 年提到有關修昔底德陷阱的演說等、於 2017 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年度會議中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提到：「中美關係不會進入修昔底德陷阱」(馬文英，2017)以及同樣是外交部的副部長樂玉成認為：「中美兩國有足夠之智慧來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徐夢溪，2019)。將這些眾多的「中國官方」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彙整起來，逐一分析。

2. 「中國學界」代表性學者的著作及評論

再加上「中國學界」的著作及評論，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金燦榮提到中美之間修昔底德陷阱之解決之道：「中美不能直接發生衝突、必須堅持底線」、「開展雙邊、區域和全球合作」及「積極處理中美雙方之分歧及矛盾」(金燦榮，2015)；學者閻學通在 1998 年就有提出有關中國崛起的研究(閻學通，1998)及其認為中美修昔底的陷阱如何破解的方法：「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建設周邊命運共同體」(閻學通，2016)等中國學者的見解。

對比美國學者 Munro 的〈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Awak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及 Huntington 〈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等論述所引發之中國威脅論、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在 2017 年首次的國情咨文中將中國及俄國視為挑戰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楊泰順，2018，頁 32-41)、其自上任以來最大的外交政策目標「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意圖「讓美國再次偉大」及其習慣在「推特」(Twitter)上之推文及公開的發言等(Burack, 2020)。而 2018 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也將中俄視為頭號威脅，並提到：「國家的戰略競爭，非恐怖主義，現在已經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United States, 2018)。

掌握中國方面看待國際間各種事件的意見取向及採取的作為，探討中國領導人的決策與「中國學界」的關聯性，進而分析中國對美的政策導向及戰略意圖，並從「中國官方及學界」的論述中發掘本文所欲探討三個問題，一是他們

認為什麼是修昔底德陷阱，二是他們認為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三是他們認為中美雙方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時間軸主要起自 2012 年 11 月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上台提出「中國夢」開始，至到 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疫情開始之前的這一段期間，「中國官方及學界」的論述中有關修昔底德陷阱之看法和其潛在意涵的發掘，以及這段時候中美之間關係的變化進行探討。在中共 2012 年 11 月召開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不斷的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讓中國這個新興崛起強權的野心逐漸浮上檯面，這也開始引起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警惕、猜疑及恐懼，於此不久之前歐巴馬政府執政時期也將戰略重心從中東地區移轉至亞洲地區，提出「亞太再平衡」、「重返亞洲」、「轉向亞洲」等戰略，中美兩國的外交政策導致雙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可能性大增，是以，將研究時間軸著重在 2012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這段期間。

二、 研究限制

本文因取材於「中國官方及學界」的論述及看法，因條件的限制，取得資料的方法有限，再者所得的資料大多數可能都已經過中國官方審核過濾，比較少會有悖離中國官方論點的資料顯現，所以彙整資料的總結方向有可能會趨向相似，較難以一窺全貌。另外筆者主要是針對中美之間權力的變化，就中國方面的角度來看待中國本身正在進行的政策及措施，以及如何面對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中的各種政策，觀察中美雙方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態度，惟因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的情勢變化萬千，再加上 2021 年美國新任總統拜登(Joe Biden)

上任後，中美關係及美國對中政策勢必與過往川普政府有所差異，但筆者會盡可能隨著時勢變化即時更新調整，就中美關係競爭的本質來進行探討，分析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以期在未來在預判中美情勢時能作為有效之參考。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文研究架構環繞在修昔底德陷阱理論，以及中美是否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並從「中國官方及學界」的觀點來探討。自從 Allison 提出中美之間是否會發生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發現及觀點後，中美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就受到全球廣泛的討論，中美關係也伴隨著各種事件(包括中美貿易戰、新冠肺炎和香港反送中等)而日益緊張，而追根究柢，撇除這些可能導致戰爭的導火線，在歷史上發生戰爭根本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新興崛起強權與既有霸權國家之間的權力變化，這也是中美是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關鍵要素。

本文第一章是緒論。第一節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回看過去到現在中國的發展及美國的影響力逐漸衰弱及中美間的權力變化，針對本文欲探討的方向提出說明。第二節為問題與方法，從新興崛起大國的角度來探討問題，亦即「中國官方及學界」對於修昔底德陷阱之不同看法；案例選擇方法特別著重在「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的論述。第三節是研究範圍及限制，本文的研究時間軸從中國當代領導人習近平自 2012 年上任後至今。第四節為研究架構及章節安排，本文架構建立在修昔底德陷阱理論上，以此為骨幹進而衍生出後續章節安排。

第二章為理論基礎。首先第一節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觀點來著手，針對「權力平衡理論」等理論內容進行探討，將現今中美關係的現況套用在相關的國際關係理論中，來推導中美之間接續的發展及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第二節是透過

「權力轉移理論」進行分析，並將理論內容應用在當今中美關係上。第三節是說明修昔底德陷阱的源起及定義，根據 Allison 在 2015 年大西洋月刊及 2017 年所出版的《注定一戰？中美是否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著作中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見解，包括他認為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兩個主要驅使原因，並對照歷史上崛起國家及既有霸權國家間導致戰爭的原因及發生戰爭的比例，以及在斯巴達與雅典爆發衝突後，縱使斯巴達獲勝，但在兩國都已成為廢墟，使希臘更容易受到波斯人的攻擊，而後斯巴達被新興的底比斯所擊敗，最終在馬其頓崛起後失去對希臘的控制。以歷史為借鏡，研究在如今中美關係間避免兵戎相見該採取的關鍵要素。第四節是探討 John J. Mearsheimer 所提出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進行探討，研究現今國際體系結構及國家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第五節是小結，總結本章節各個理論的主張，找出較適用於現今中美關係現況的理論。

有鑑於在中國國內對於各項議題的探討主要都是以「中國官方」為主，且「中國學界」的論述也會受到官方的影響甚鉅，是故本論文第三章首先是就「中國官方」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深入探討。第一節針對中國當代領導人習近平，於公開場合對於與修昔底德陷阱有關的演說及言論進行分析。第二節是對於從習近平上任擔任中國國家領導人至新冠肺炎爆發前中國外交部及其他官方部門的觀點作蒐集及探討。第三節是討論「中國官方」觀點的特性，包含中國共產黨對於當今中國在政治體制上和制定外交政策所造成的影響，以及針對「中國官方」整體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所呈現出特別現象進行研究，並統整出本論文在蒐集綜整「中國官方」觀點時之發現。第四節為小結，將「中國官方」的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做統整，包括「中國官方」認為修昔底德陷阱為何，中美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及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第四章是就「中國學界」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依據中國國內針對國際關係議題具有權威性的學者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所公開發表的文章、言論、期刊等進行研究。在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及第四節中，本文擬

分別在中國境內國際關係學院中具有代表性及排名前面的學校和中國國內排名第一名的智庫中，選擇最有影響力及在國際關係領域有相當深入研究之學者著手，分別彙整涵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王緝思(第一節)、「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閻學通(第二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金燦榮(第三節)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袁鵬(第四節)等學者的觀點，進行深入分析，有別於西方國家學者的觀點，從「中國學界」的角度來看待中美關係的發展。第五節是小結，將「中國學界」的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做統整，包括「中國學界」認為什麼是修昔底德陷阱，其對於中美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看法之解析及修昔底德陷阱的解決之道。

第五章是本文的結論。第一節是比較「中國官方」與「中國學界」在對於中美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看法上各自的差異，分析兩者與當前中國各項政策的關聯性，對於中國官方與學界的共識與看法不同之處深入研究。第二節總結本文的研究發現，對於「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間就修昔底德陷阱在看法上的異同進行總結，歸納出中國未來可能採取的外交戰略作為及其想要向美國和全世界傳達的訊息和潛在意圖。第三節提出後續的研究方向及研究建議並說明中美間未來可能面對的挑戰及後續的發展。

第二章 理論基礎

在當今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當中存在著各國學者所透過觀察或實驗所得來的各種國際關係理論，這些理論是關係關係研究者利用智慧，對於特定範圍中的事物進行描繪所呈現的畫面，並使其他人了解各種要素的重要性，並分析出彼此間的關聯。這是在各項要素間分析因果關係，對於重複發生的事件提出來闡述，以使在國際間運用各項不同變素來預測可能發生的事情。本章節針對當前中美關係情勢的變化擬透過四個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即在「權力平衡理論」、「權力轉移理論」、「修昔底德陷阱」及「攻勢現實主義」這四項著名的國際關係理論中試圖比較中美關係在各理論中的情勢預測並進行分析和判斷現今中美關係情是否有接近「修昔底德陷阱」理論之趨勢。

第一節 權力平衡理論

「權力平衡理論」，在現今的國際體系當中，主要在探討國家間在某些地區或體制下如何形成均衡的形式。在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擔任國務卿的時候，他曾表示權力平衡在現在的二十一世紀已經過時。但李光耀有不一樣的想法，他認為：「權力平衡在過去的概念中主要蘊含著軍事的力量，但套用到現今的國際社會，他是代表著軍事和經濟的總合，甚至在經濟方面的重要性還勝過軍事方面。」(Allison 著，包淳亮譯，2020年，頁50)。

一、何謂權力平衡理論

權力平衡的概念，也就是「均勢」，Hans Morgenthau 指出在國際間各國均會追求權力，而不論是維持或者是打破現狀，各國間最後都會形成一個權力相互制衡的局面，這時就出現了「權力均勢」，也是維持國際體系穩定的主要因素。這套理論主要根據過去歐洲的歷史進行分析，歐洲各國不存在永遠的盟

友，各國都是為了權力的平衡而改變政策調整其在體系中的位置，為了維持均勢，均勢的平衡者國家會將自身的權力會投向權力相對較弱的一方。均勢平衡者國家是影響國際均勢體系的最重要的成員，由他來決定均勢的方向，使任何一個國家都沒辦法擁有超出國家層級的權力優勢(Morgenthau H., 1985, pp. 11-14)。

Jack Levy 則針對權力平衡理論提出了以下不同的看法：一是權力平衡理論本身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二是自從冷戰結束之後，各國並沒有在世界上與美國抗衡呈現出均勢的局面，而是讓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獨大；三是權力平衡並不一定是國際體系的目標，國家才有目標，國際體系是用來闡述的架構並沒有所謂的「目標」；四是雖然權力平衡是為了達到和平，然而世界各國卻把更多的利益置於和平之上，從而使得戰爭被國家視為並非不可接受的手段。；五是基於國際體系會進行抵制，在權力平衡體系中並不會有霸權的出現，然而沒有發生戰爭的原因這能是因為潛在的霸權願意維持現狀(Levy, 2004, pp. 29-51.)。

二、權力平衡與地緣政治

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 John J. Mearsheimer 提到，一個國家制衡政策的訂定其中一項關鍵因素就是地理位置，他認為因為大西洋及太平洋的存在。亞洲、歐洲、美洲的國家之間彼此沒辦法征服，不可能出現跨足各洲的世界性大國，只有可能出現區域性的霸權，某些區域霸權會運用的地緣優勢，成為離岸平衡者，制衡其他區域霸權崛起(Mearsheimer, 2001, pp. 236-237.)。

新的權力平衡涵蓋了軍事與經濟層面，其中經濟的層面包括從經濟制裁、貿易交流、投資政策及網路佈局等手段來達到地緣政治的目的，Robert Blackwill 和 Jennifer Harris 在《使用其他手段的戰爭》(*War by Other Means*)一書中提到：「中國是在實施地緣經濟(Geoeconomics)的外交策略上最具成效的國家，他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可能是將過去著重在區域或全世界軍事力量的擴展轉變成

經濟能力的突破，藉由經濟的手段來維護及增進國家利益，並衡量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對於自身經濟的影響，促進地緣政治的成果。」(Blackwill & Harris, 2016, p. 11)。

當今中國主要是透過經濟來執行外交政策並達到外交目的，是幾乎所有重要亞洲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所組成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東協)的國際組織建立「東協自由貿易區與中國」，成為「東協加一」，為目前全球總人口數量最多，且最大之開發中國家自由貿易區，發揮他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在美國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後改名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後，中國卻加快在這個區域發揮影響力，積極的研究加入CPTPP的相關事宜，企圖主導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建構新的發展格局，以實現最終的政治目標。中國基於過去對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要求擁有更多的投票權遭否決表示不滿，於2013年自己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強化了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與區域的合作，在2015年4月創始成員國申請結束之時，共有多達57個國家申請加入，其中還包含英國在內。亞投行的成立，與中國在2014年成立的「絲路基金」，分別為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沿線開發中國家提供了資金與融資上的支援，「一帶一路」最初是習近平在2013年所提出，其中包括了兩大經濟路線，即「一帶」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及「一路」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讓中國串連了歐洲、中東、南亞、東南亞等地區國家，朝著歐亞大陸一體化的發展前進。再加上六大經濟走廊，包含「中蒙俄經濟走廊」、「新歐亞大陸橋經濟走廊」、「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及「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針對歐洲、印度洋、東南亞及其他亞洲國家之重大交通連接基礎建設進行推動，這條在過去中國古代的貿易路

線再次被鏈結起來，以「五通」為首要合作目標，就是「民心相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設施聯通、政策溝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7年)，整合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交通、外交及金融，這也將中國的權力向外投射到各大洲，顯示出地緣政治的權力平衡朝亞洲大陸前進的跡象，中國「一帶一路」的外交戰略也在2017年寫入黨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核心價值(薛健吾，2020年)。

中國透過經濟上的影響力來執行政治目的的效果逐漸發酵，經濟觸角延伸到全世界，國際間權力的板塊已經開始鬆動，權力的天秤開始朝中國傾斜，全球的權力平衡正在發生轉變。如今，當重要國際事件發生時，首要考慮的已經不是先思考華盛頓會抱持怎樣的看法，而是北京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

權力平衡理論的重點在於該理論認為兩大國在權力平衡時容易維持和平，而在權力不平衡時，權力大的一方有侵略的動機。若將權力平衡理論的預測套用在當今中美關係的狀態中，其預測中美間的權力競逐若伴隨著國際體系上權力板塊變化而逐漸失衡，發生戰爭的機率將會大大提高。

第二節 權力轉移理論

在1958年A.F.K. Organski對於權力轉移理論的論述中，他提到權力轉移理論與權力平衡理論主要不同之地方為，相較於權力平衡理論，當國際體系中權力呈現「均勢」的局面時，國家間反而是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態，更容易發生戰爭；相反，權力不平衡的國際體系才是維持和平的重要關鍵(吳玉山，2011年，頁386-391)。

權力轉移理論主要是說明在世界各國的權力是由各個階層所分配的不同權力多寡的權力金字塔所組成，權力並非是平均分布的，而是少數國家掌握了大多數的權力，其中在金字塔最頂端的是具主導地位的強權國家(Dominant

Power)，擁有大部分的權力及最龐大之資源，次之是一般強權國家(Great Power)，再次之是中等國家(Middle Power)，最後是小國(Small Power)。所有國家都承認此類的存在及其中權力的相對分佈，且區域的階層體系相較是位於全球體系之內，所以區域權力體系的運作會受到全球性的具主導地位的強權國家影響，是故，在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下，戰爭可以從全球範圍擴散到區域範圍，但不會從區域向上延伸到全球範圍(吳玉山，2011年，頁390-391)。

一、權力金字塔

首先在權力金字塔頂端是具主導地位的強權國家，在這個階層體系中具主導地位的強權國家指的並不是霸權國家(Hegemony)，他不能獨自控制其他大國的行動，相反的，他保持了「對潛在對手的權力優勢」，並「根據有利於他的聯盟並滿足聯盟國家所期望的原則來管理國際權力體系」，在國際上建立及維護有利於自身的遊戲規則，即一套國際體系，以維持其具主導地位的狀態(Rapkin & Thompson 著，高一中譯，2016年，頁66-67)。

接著權力往下一階就是一般強權國家，一般強權國家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它們的作用是共享資源分配並幫助維護國際體系。而在強權國家中還是會有潛在的挑戰者，這些挑戰者是指其國力接近具主導地位強權國家國力的八成或以上的國家，它們沒有完全服從具主導地位強權國家的控制，如中國就可能是潛在的挑戰者。

再往下是中等國家，儘管他們的力量不容忽視，但要挑戰具主導地位強權國家對世界的控制實力還遠遠不夠。最後是小國，只有些許的權力和少量的資源，並不會威脅到超級強權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地位(Tammen 等著，向駿譯，2003年，頁5-8)。

二、何謂權力？

在權力轉移理論中權力的定義為：「讓對方遵從我方意願的能力。」(Tammen 等著，向駿譯，2003 年，頁 9)。

組成權力之構成要件有三個：一是可以戰鬥及工作的人員多寡、二是前述人員在經濟上的生產力、三是為實現國家目標而統整及取得的個人貢獻在政治體制上的有效性，即相對政治力，在政治方面有能力的政府能夠取得更多的資源。這三個要件會對一個國家向其他國家發揮影響力的能力產生改變(Rapkin & Thompson 著，高一中譯，2016 年，頁 65-69)。

在全球或地區的權力分級中各個國家對這套運行原則的滿意度是後續引發戰爭還是和平的關鍵。導致戰爭的機率最高的情況是國家間處在權力均衡 (parity) 的結構上，當一個國家試圖在權力階級中提高自身國家地位的想法將在國家之間引起衝突和對抗。對現狀不滿意的國家將挑戰這種結構，但這在強國國家中的衝突較少，因為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均認可當前國際體系的既有規範。這些對當前狀況感到滿意的國家探索著相同的處理問題方法，以增強其在國家經濟及安全利益。

在權力階層中，由具主導地位強權國家訂出一套國際社會的運行規則及國際規範，在權力階層內的國家都必須遵守這套規則，所以處於權力階層體系中位階較高的國家相對於階層體系位階低的國家而言，會比較滿意當前的狀況。在權力轉移理論中，超級強權國家一定對現狀感到滿意，並會維護當前的國際體制及權力階層狀態，成為既有體制的維護者；相反的，位處於權力階層體系低階的國家會認為自己遭受國際上不公平的對待，所得的利益不符合自身的期待，然而大部份不滿現狀的國家力量均較弱小，對超級強權國家及權力階層體系不構成威脅，僅有少數的一般強權國家會有不滿現狀的情形發生，然而這些少數一般強權國家可能就會成為具主導地位強權國家及當前權力階層體系

的挑戰者，從而影響到引發戰爭的可能性(Tammen 等著，向駿譯，2003 年，頁 11-13)。

三、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在權力轉移理論中，讓戰爭一觸即發的關鍵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權力均衡(parity)，即在權力階層體系中，一般強權國家的綜合實力達到具主導地位強權國家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時，發生戰爭的機率大幅提高，而當一般強權國家成長到具主導地位強權國家的綜合實力超過百分之二十時，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就會降低，而在具主導地位強權及一般強權實力相近的這段權力範圍就是權力均衡的情勢，在這段時間內是可能發生戰爭的高峰。二是超越(overtaking)，即當崛起的一般強權國家的實力快速成長，且成長速度較原有具主導地位強權國家還快，在由曲線所構成的相對權力關係中先與超級強權進入權力均衡的狀態後，持續發展超越具主導地位強權國家，在超越的這個時間點引發戰爭的可能大大增加(Tammen 等著，向駿譯，2003 年，頁 28-29)。(如圖)

由圖中可以看到在權力轉移理論的架構中，當崛起挑戰者與既有體系維護者的權力處於不平衡的狀態時，雙方對於實力的差距有共同的認知，即便挑戰者對現狀不滿卻無力改變現狀，會選擇延續和平的遵守當前規範，國際體系會相對穩定，發生戰爭的機率低，相反，如果崛起挑戰者與既有體系維護者的力量達到均等時，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將大幅提高，國際體系相對不穩定難以維持和平。權力均衡(parity)與超越(overtaking)所引發的衝突取決於崛起挑戰者欲改變現況的意願，並依據其國內決策集體來衡量破壞現有體制所需面臨的風險，決定是要進行改變，而在既有體系維護者的立場，之所以會發生戰爭是因為既有體系的維護者無法說服崛起挑戰者使其認知當前體制對於彼此都是有利，故維護者無需對當前國際體制提出改變的要求，也是因為如此，挑戰者與既有體系維護者的對當前國際架構的滿意程度也關係著戰爭機率的多寡，即既有體制

的維護者對於權力轉變的妥協而決定讓出領導者的地位也會讓挑戰者滿足於現有的體制架構，從而認為沒有必要發生衝突，所以權力和平轉移，戰爭發生的機率也會降低(吳玉山，2011年，頁391-392)。

於權力轉移之過程中，在權力狀態到達均衡時是最有可能發生戰爭之時機，且在國力超越或被超越的國家中至少有一個國家不滿意於當前國際體系的情況下。因此即便超越的情況發生在兩個滿意於現狀的國家之間，衝突也不會發生；反之，對現狀不滿的挑戰者會利用權力均衡的機會及實力超越對方的時間點，試圖尋求改變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國際體系，在預期未來自身實力持續快速成長的情況下，取得勝利是很有機會的，從而認為戰爭值得一試。

四、中美間的權力轉移

A.F.K. Organski 曾說：「在權力的此彼消長下，所要探討的不是中國將來是否有可能超越美國，而是成為最具影響力之國家中國需要花費多少的時間，或許時間很長，但是美國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總有一天還是會讓位給中國。」(Tammen 等著，向駿譯，2003年，頁257)

唯一能夠運用軍事及政治力量在全世界上任何地方發揮影響力的國家就是美國。當中國在人口、經濟及政治上的能力等綜合國力超越美國時，國家間的權力將會發生轉移，已因應新的現實狀態，然而中國的綜合國力要超越美國，必須在下列兩個前提維持不變的情況下：一是中國繼續推進經濟發展及延續一定程度以上的經濟成長；二是維持中國當前政治體制的穩固，即中國共產黨的當權者地位不能崩潰或分裂(Tammen 等著，向駿譯，2003年，頁260-261)。

中國的國力持續擴展，伴隨著豐富的人力資源及日益增長的生產力，對外也逐漸展現他的國際影響力，權力轉移的過程開始展開，在這期間衝突的管控對避免戰爭的發生相當重要，根據權力轉移理論所衍生出的應變方案有以下三

點值得關注：一是培養讓兩國都滿意的權力轉移過程所需的條件，使兩國領導人都不希望發生戰爭；二是針對領土的主權爭議在可能引爆戰爭的區域導火線進行審慎的評估處理；三是針對彼此所擁有的權力進行適當的改變，惟權力增加的區塊及多寡是由美國決定，不過相對地，提高中國權力的同時，美國的權力也必須跟著提升。上述三個方案可以一起進行被探討研商並交互運用 (Tammen 等著，向駿譯，2003 年，頁 264)。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當新興崛起大國的權力接近既有霸權國家的時候，崛起大國向霸權國家發動挑戰的機率會提高，而在該理論中崛起大國對於現狀的滿意度占了很重要的因素，是故一旦崛起大國與霸權國家權力接近，崛起大國又對現狀感到不滿意的時候發生戰爭的機率是最高的。所以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可以推測，中美之間伴隨著中國權力的迅速提升到接近美國權力的程度，再加上若是中國對於現狀是感到不滿的話，則中美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會相對大幅提升。

第三節 修昔底德陷阱

相較於過去，「修昔底德陷阱」一詞在中美關係日益僵化的現今更加頻繁的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中出現，依據古希臘學者修昔底德說明為：「正是因為雅典的崛起，所造成斯巴達不可抹滅的恐懼，進而使得戰爭無法避免。」作為一名曾經的士兵，修昔底德觀察了發生在西元前五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描繪了新興的崛起國家雅典挑戰了當時的霸權國家斯巴達，爆發了全面性的戰爭，結果兩敗俱傷以斯巴達慘勝收場，然而斯巴達國力受損氣力消耗殆盡，後續其在希臘的影響力被崛起的馬其頓王國所取代。「修昔底德陷阱」也代表著自然而然且無法避免的紛爭，伴隨在新興崛起的一方欲打破現狀取代既有統治者的時候。

2015年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貝爾福科學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前主任Graham Allison《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會走向戰爭嗎？〉(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首次把「修昔底德陷阱」運用在現今的中美關係之中而引發全世界廣泛的討論及矚目，在文章中他提到：影響我們這一代國際秩序的決定性問題是兩國是否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臘時期之學者的隱喻提醒我們伴隨在崛起大國及既有強權間所存在的危險，且這類情形大部分雙方的結局都很糟糕，若要避免爆發戰爭，挑戰者與被挑戰者之間的態度及行動都必須做出巨大而痛苦的調整。修昔底德指出，形成兩個競爭對手間的權力平衡快速變化所衍生不可避免的結構性壓力，有兩個主要原因所驅使，一是崛起大國的權力不斷提高，對自身重要性的認知及在國際上要求更多的發言權及控制權；二是既有霸權對於這種情況所產生的恐懼、不安全感及企圖捍衛以維持現狀的決心 (Allison, 2015)。

一、 伯羅奔尼撒戰爭

在西元前490年，斯巴達已經擔任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陸上主要強權超過一個世紀，至當時斯巴達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家庭乃至全社會都致力於戰鬥能力的提升及展現，擁有強大的陸上軍隊，鮮少干涉其他國家的事務，致力於國內黑勞士叛亂的壓制及確保區域的統治地位，是君主及寡頭政治的保守大國，在政治及文化上與雅典有顯著差異，相較之下，雅典社會較為開放，面對事物勇於創新，半個世紀以來在文化上有長足的發展，作為哲學、歷史、貿易、建築、民主及海軍實力的領航者，隨著其影響力及自信心的增加，對於過去不公平現象的想法、要求受到尊重及企圖改變過去制度以反映新興權力的意識逐漸浮出檯面，雅典認為他們權力的擴張是良性的，他們在向人類的發展進行推移，毫無保留的伸手觸及他國內政及推動民主、擴大聯盟，甚至在戰爭爆發前一名雅典的外交官在斯巴達的會議上說到：「我們並非希望他人效法，然而弱

者服從強者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Thucydides 著，謝德風譯，2000 年，頁 57)，帝國野心似乎沒有盡頭。這也威脅到既有統治者斯巴達所建立的體系，斯巴達認為雅典是因為在他所維持的環境下才得以成長茁壯，雅典壯大後的種種行為是不合理且忘恩負義的。壟罩在雅典的成長底下，是斯巴達與日俱增的不安與憂慮。

在西元前 435 年的一場斯巴達的同盟國柯林斯與中立國克基拉的衝突中，雅典陷於戰略困境，被迫於在協助尋求幫助的克基拉，破壞與斯巴達的「三十年和平」；與眼睜睜看著克基拉被柯林斯征服，失去海權的優勢地位，兩者之間做出選擇。斯巴達也面臨兩難的情況，一是無所作為，就可能讓雅典掌握整個主導權，處於被動的姿態，且須面對其他盟友的指責；二是一旦支持柯林斯，可能會導致雅典為了維護海上軍力的優勢而加入戰局(Allison 著，包淳亮譯，2020 年，頁 67-68)。

最後雅典派出一支象徵性的海上軍隊前往克基拉，卻被柯林斯視為挑釁；另外在西元前 432 年雅典的第一公民「伯里克利」在米加臘頒布了《米加臘法令》，被斯巴達認為是違反體制要求廢除，讓雅典國內趕到國家主權受損而強烈反彈。對於雅典的作為在斯巴達國內主戰派的眼中被視為一種忤逆，對斯巴達的安全已經構成威脅，將會間接導致聯盟的崩解，認為應該要強勢做出回應。再加上當時的柯林斯使者對斯巴達說道：「正是因為過去你們的無所作為，沒有在他們還弱小時就摧毀他們才會導致今日敵人的倍數成長，所以你們都有責任(Thucydides 著，謝德風譯，2000 年，頁 51)。」並宣稱斯巴達若再不作為將會退出聯盟。從此刻開始，斯巴達已經贊同雅典肆無忌憚的擴張對於他們自身的安全及權力構成嚴重威脅，除了戰爭一途以外沒有其他的解決辦法，最終，戰爭爆發了。雙方在戰爭的摧殘下筋疲力盡，由斯巴達艱苦的勝出，但國力耗盡，財力所剩無幾，聯盟分崩離析，隨後被新崛起的底比斯(Thebes)輕易擊敗，而後受制於馬其頓王國(Macedonia)並走向衰亡，希臘璀璨文化就此終結。

在雅典遠征中立國米洛斯的過程中，因為米洛斯不願加入聯盟與雅典同盟，也不偏向衝突的任何一方，最後被雅典屠城，在過程中修昔底德稱雙方的談判為〈與米洛斯對話〉(Melian Dialogue)，其中雅典使者對米洛斯人的一段話也作為日後現實主義的經典範例，他說道：「大家都知道，只有當對手力量相等時才有資格講權利，在現實世界中，強者可以任意而行，弱者則只能忍受。」(Allison 著，包淳亮譯，2020 年，頁 70)。

從斯巴達與雅典的發生戰爭的啟示中，可以觀察到「一個國家如果未能依據該國當前主要的利益來採取行動，追根究底可能是因為政策必須與國家內部進行妥協，導致政策未能有完整的連貫性及通盤的考量 (Allison 著，包淳亮譯，2020 年，頁 69)。」兩者都沒有明顯的戰略優勢，且都對於自身的能力過度有信心。

二、 修昔底德陷阱對中美關係的啟示

探究斯巴達與雅典彼此競爭最終導使戰爭之原因，根據修昔底德之看法，他提到追根究底是因為新興崛起國家及既有統治強權間不可避免的結構性壓力，競爭導致陷入僵局，彼此間國內鷹派聲勢高漲，雙方更加敵對，統治者也因此面臨著國內巨大的政治壓力，致使未能根據國家最重要的利益進行決策，被迫做出妥協。修昔底德也提到，推進雙方走向戰爭的力量來源有三個：「利益」、「恐懼」、「榮譽」(Allison 著，包淳亮譯，2020 年，頁 71-73)。

(一) 利益

國家「利益」，國家生存的根本，斯巴達在面對雅典無限制的擴張，認為已經威脅到他的利益，促使聯盟的崩潰，危及到自身的在希臘統治地位。因此戰爭便成了唯一選項。

(二)恐懼

「恐懼」，人們看到的客觀情形會被情緒所左右，斯巴達身為當時的統治強權，在看待新興崛起國家時可能會受到恐懼的情緒所影響，導致加深與雅典間的猜忌及嫌隙，對情勢產生誤判及誇大它的危險程度。

(三)榮譽

「榮譽」，涵蓋了一個國家人民的「自我認同」，當新興崛起國家隨著經濟、軍事及外交的能力逐漸增長，權力的擴張會讓新興崛起國家覺得應該得到更多的尊重，並在各國間要求更大的話語權及影響力。

雅典日益的擴張使得斯巴達更加的擔憂，致使戰爭愈來愈不可避免。雙方陣營都有政治家極力避免戰爭的發生，但結構性的權力變化，讓訴諸武力看起來變成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法。最後，引爆戰爭。

三、 戰爭是否不可避免

古希臘的歷史所帶給我們的啟示，由逐漸膨脹轉變成了自負，情緒化的恐懼不安演變成了歇斯底里。在修昔底德所建立「修昔底德陷阱」之架構中，區分為「崛起的強權併發症」(rising power syndrome)及「統治的強權併發症」(ruling power syndrome)。「崛起強權併發症」係伴隨著新興崛起大國的成長，與之驟增的強烈的自我認同，對重要利益的渴望以及能被其他國家所尊重與承認。而「統治強權併發症」乃是既有統治強權對前者的反射，使其彷彿看到了過去崛起的自己，在面對可能即將來臨的衰退之下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終日惶恐而不安，並在不知不覺中誇大崛起強權所帶來的危險性(Allison 著，包淳亮譯，2020年，頁 78)。

四、 Aillson 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誤解

(一) Kirshner 對 Aillson 觀點的評論

Jonathan Kirshner 在 2019 年〈謹慎處理：正確理解修昔底德著作的重要性〉(Handle Him with Care: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Thucydides Right)文章中對於 Aillson 的看法提出了反駁，認為其對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有誤解，他提到 Aillson 陷入了「施羅德陷阱」(Schroeder Trap)，即「對於歷史的態度無意識地忽略了它的複雜性、細微之處以及如何明智的善用問題，僅是擷取歷史的表面，無視上下文及更深層的意涵，而建立出一種未經檢驗的假設」(Schroeder, 1994)。

Kirshner 認為 Aillson 在看待過去歷史上修昔底德陷阱的解讀過於簡單化，且有許多的錯誤，除了在《注定一戰，中美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中本身的前後自相矛盾外，他主要提到幾點在該書中與歷史不相符及錯誤的部分如下：

1. Allison 誤認為雅典與斯巴達都為了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與此相反，雅典的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是戰爭堅定的擁護者，拒絕妥協及透過談判來解決問題的提議，他的中心理念是「必須徹底了解戰爭是必要的」，而他也成功地說服的雅典的公民，使得公眾投票支持戰爭(Kirshner, 2019, pp. 13.)。

在斯巴達的部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前夕，也並沒有迫切地尋求和平的解決方案，反而是拒絕了仲裁的建議，因為他們認為在前一場戰爭之中，當時如果繼續進攻情況是會對自己有利的。在古希臘，戰爭是一種合法、正常且常見的行動，雅典與斯巴達雙方都更喜歡戰爭而非和平(Kirshner, 2019, pp. 14.)。

2. Allison 誤認為雅典的悲劇是因為做出戰爭的決定

Kirshner 提到修昔底德認為悲劇不在於戰爭的發生，而是因為雅典為了奪取更多的傲慢自大進而導致自己災難性的失敗。而伯羅奔尼撒戰爭所帶來的重啟示是雅典確實成為修昔底德陷阱的受害者(Kirshner, 2019, pp. 15.)，惟這是來自於大國內部「致命危險的傲慢陷阱」(Kirshner, 2019, pp. 22.)。

Kirshner 評論道：「新興崛起大國往往因為傲慢自大，在所處的體系及地位的約束下感到不滿及憤怒；既有霸權國家則是滿足於現狀，對於不受控制的崛起者之動機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以至於不敢作出絲毫的讓步，以避免激起對方興趣而提出進一步不合理的要求。然而這些都將會導致災難性的戰爭發生。」(Kirshner, 2019, pp. 18.)。

儘管有許多的批評，但 Kirshner 認為 Aillson 在探討有關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整體動機仍是良善的，即：「中國和美國可能會陷入一場雙方都不願意發生的災難性戰爭之中，且這種危險發生的可能性比大多數人想像的要大得多。」(Kirshner, 2019, pp. 24.)。

(二)陳村富對 Allison 觀點的評論

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現職於浙江大學及杭州大學擔任教授的陳村富，著有《希臘哲學史》(四卷，合著)等著作，他在 2020 年〈古希臘有過「修昔底德陷阱」嗎？—艾利森教授造假背後之「圈套」〉一文中提到，認為 Aillson 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假借修昔底德之名為中國所量身訂做設下的「圈套」(陳村富，2020 年，頁 356-357)，並對於 Aillson 著作中幾項與事實不符之處的提出批評：

1. 雅典與斯巴達實際上一方是在海上稱霸，另一方是在陸上稱霸，各自向外拓展的領域與方向並不相同，惟 Aillson 並未提及。

2. Aillson 所言：「新興崛起國家及既有統治強權間不可避免的結構性壓力，致使衝突產生」，原句其實為「權力成長—恐懼—戰爭」。
3. Aillson 所翻譯的「注定一戰」希臘原文其實是「迫使其投入戰爭」。
4. 雅典與斯巴達並非崛起國與守成國關係，而是兩強同時並存(陳村富，2020年，頁 356-357)。
5. 發生戰爭的真正原因為雅典與斯巴達雙方領導層為了個人利益，棄城邦安危於不顧、過於貪婪及追求權力所造成的(陳村富，2020年，頁 361-362)。

陳村富認為，所要避開的並非 Aillson 的「偽修昔底德陷阱」，而是要避免掉進 Aillson 所設計的「圈套」中，應該要對於中美兩國進行更進一步的了解，更確切的認識世界(陳村富，2020年，頁 362-363)。

Aillson 在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的主要立論點是既有霸權國家在面對新興崛起大國的崛起以及這在既有霸權國家所形成的恐懼，使得雙方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大增。另外「恐懼」、「利益」、「榮譽」這三項因素在該理論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是引發衝突的動力來源。修昔底德陷阱之於現今的中美關係可以推論，中國一旦崛起，而美國因為中國的崛起而產生恐懼；再者中美雙方各自所重視的核心利益上相互衝突；在加上中美雙方的政府制度、意識形態、市場機制、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分歧，以及中美雙方自我認同的增強，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美國要讓美國再次偉大之「美國夢」，彼此身為各自文明代表分別肩負著東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之榮譽。中美於這樣的情形下，戰爭一觸即發。

第四節 攻勢現實主義

提出著名國際關係理論「攻勢現實主義」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 John Mearsheimer 曾說道：「如果中國要繼續崛起，那麼它必須為戰爭做好準備，並將統治亞洲的模式遵循美國過去統治西半球的方式。一個國家如果要生存，最好的且最安全的方式是成為區域霸主(regional hegemon)。但是，美國及中國的周遭國家肯定會試圖抑制中國，阻止其尋求霸權。這將會造成安全競爭(security competition)，最後對亞洲地區的安全構成威脅。」(Mearsheimer, 2001, pp. 23)。

一、何謂攻勢現實主義？

攻勢現實主義理論中的觀點認為：一個國家將成為國際體系中的霸主視為最終目標。在沒有任何國家能夠確保所有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大國所關注的重點就是如何生存，其中的關鍵就是權力。因為在國際體系中孕育了一個國家間透過侵害對手來得到權力的絕佳環境，沒有國家會想要維持現狀，所以一旦一有機會出現，在所需付出代價相對能夠接受的有利情況下，大國身為一個冷漠的權力追隨者會選擇破壞權力平衡以得到更多的相對權力，這也是獲得安全最好的方法(Mearsheimer, 2001, Ch.2.)。

攻勢現實主義所探討的主體是大國，主因是在國際上每一個國家皆會受到大國政治的影響，各國的命運基本上都是由在國際上富有權力的大國來決定。而被稱為大國所需具備的條件取決於其相對軍事能力，他需要具備在傳統軍事正規戰中足以與世界上實力最強國家一戰的能力(Levy, 1983, pp. 10-19)，就算最終無法獲勝，但大國有著對最強國家的國力消耗能發揮顯著效果的潛藏實力。

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目標就是最大程度地掌握世界上的權力，追求相對權力的極大化，這代表了國家間是以損害其他國家為代價從而獲得了權力。國家所要的並不只是贏過其他的大國而已，而是期望在自身國家所處的體系中最後只會存在一個霸主(hegemon)，而那個唯一的霸主國家就是自己。

每個國家都是以自身利益為前提隨時尋求改變，沒有一個大國會滿足於現狀，除了暫時已經成為霸權的國家，才會為了延續統治地位而竭盡所能維持現狀。如果達到目標的代價過高，大國會暫時等待及忍耐尋求更好的時機(Claude, 1962, Ch.2.)，但權力擴張的慾望始終都在，如果能夠付出適當的代價來達成目標，大國會不惜發動戰爭來促使權力平衡的轉變(Ernst B. Haas, 1953, pp. 442-447)，這當中也存在著修正主義(revisionist)的思想形態。所有國家的最終目標就是成為眾多國家中至高無上的霸權(hegemony)，然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成為全球的霸權，所以大國間的競爭就會不斷的持續發生，永遠存在。而在這種大國間權力競逐的狀況下，每個國家的行動會隨著當前的權力變化而改變，一如當一國發現當前情勢有利於對手時，他就會傾向維護權力平衡，防止對手獲取權力；相反，一旦當前情勢轉變為有利自己國家時，就會想辦法破壞平衡。這是由於國際體系「結構」的緣故，導致各國為了追求安全而做出互相侵略的行動。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國際體系「結構」之三種特性：一是沒有一個高於國家且至高無上的世界級權威來捍衛國家的不可侵犯性；二是國家始終擁有用於進攻目的的軍事能力；三是每個國家永遠無法知道其他國家的真實意圖。相對於對手的實力越強生存機會越高，唯一保證國家生存的方法就是成為霸主，導致國家間除了侵略他國及追求更多的權力外別無他法。

(Mearsheimer, 2001, pp. 23)

在攻勢現實主義的世界中，大國之間之所以會相互爭奪霸權，主要是基於五個假設(assumption)，一旦這五個假設皆成立，他所形成的國際體系造就一個國家間為了爭奪權力而相互侵略的環境，各國間會受到國際體系的巨大壓力及

害怕其他國家可能的侵略行為，所以只要獲得權力的機會浮現，國家就會考慮採取行動，以免落於人後，大國間每個國家伴隨著恐懼(fear)，自助(self-help)地在追求相對權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 (Mearsheimer, 2001, pp.17)。而攻勢現實主義的這五個假設就是：一是國際體系是一個無政府狀態。這代表的國際體系是由多個國家行為體所組成，但未有一個凌駕於國家級權力之上統領及管理所有國家的角色存在(Dickinson, 1916)，政府以上再無政府(Claude, 1988, pp. 14)；二是大國具備有侵略他國的軍事能力。一國的存在本身就是其他國家的危險；三是國家永遠沒辦法真正瞭解別的國家之真實意圖。每個國家都沒辦法斷定其他國家會不會將軍事力量運用在攻擊他國的意圖上；四是大國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生存。為維護國家的主權及領土的完整性，生存的意志凌駕在其他需求之上，國家唯有建立在生存著基礎上才有能力去尋求其他的目標；五是每個大國都是理性的行為體。國家會衡量什麼是國家的優先選項及對所要採取的行動評估可能造成的影響(Mearsheimer, 2001, pp. 16-17)。

攻勢現實主義的邏輯基礎就是「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乃是一國為強化自己的安全所採取之行為可能會危害到其他國家的安全。一國之所得必定是他國之所失。這意味著國家所追求的是相對權力(relative power)而非絕對權力(absolute power)，致使國家沒辦法在不影響他國的狀況下提升安全，而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還認為，只要國際體系是處於無政府狀態，安全困境的情況就會永遠持續下去。

二、攻勢現實主義概念中的「權力」

權力是指一個國家可以取得之特定資源。一個國家所能運用的資源越多，就越容易在戰略競爭中佔據主導地位。權力區分為「潛在權力」(potential power)及「實際權力」(actual power)，其中「潛在權力」是取決於國家的人口數及財力的規模；「實際權力」則是建立在陸軍的軍事實力以及海軍和空軍的支援能

力上，陸上部隊因為作為侵略及控制領土的主要力量，所以是軍事實力的核心所在。是故，充沛人口及大量財富是國家能夠將其潛在權力轉化為實際權力以建造強大軍事部隊的兩種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攻勢現實主義主要是由軍事力量的角度切入來探究權力，權力的平衡基本上也就代表著軍事權力的平衡，這也被視為國際政治的最終手段(Mearsheimer, 2001, pp. 23-24)。如今中國的潛在權力日益增加，伴隨的經濟突飛猛進的成長帶動財富的急遽提升，再加上原本就十分充足的人口數量，成為與美國軍事力量並駕齊驅的軍事強權也並非是遙不可及的一件事，這也導致美國對中國的憂慮與日俱增，深怕中國總有一日會成區域霸權挑戰美國原本身為全球唯一區域霸權的優勢地位。

三、國家如何存活？

若非一個國家在核武方面能夠取得顯著的優勢，否則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成為全球的霸主。統治世界的最主要障礙是，一個大國要跨越大洋去征服對手的領土來是非常困難的。一個大國達成的最好目標就是成為一個區域霸主，並在鄰近或容易接近的地區盡可能多地進行控制(Mearsheimer, 2001, pp. 22)。

已經成為區域霸權的國家，為了防範可能成為能夠與其一較高下的潛藏對手浮現，通常都會避免其他地區出現區域霸主並防止其他大國複製他的成功模式，以預防新的區域霸主成為超越自身的存在。既然大國無法成為世界霸主，所能追求最可行的理想狀態便是成為世界上唯一的區域霸主，並防止其他地區出現區域霸權，他會希望透過其他地區多個大國之間的相互制衡來避免在當地的區域霸權出現，以免其他地區的區域霸權日後與在自身區域對自己不滿的國家結成聯盟影響區域內原本的穩定以及及威脅自身全球唯一區域霸權的地位，一如當今的美國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區域霸主，沒有任何其他區域的大國能夠能為區域霸主與之匹敵。

四、「離岸平衡」戰略

如果要防止其他地區的大國稱霸，便要在該區域建立權力平衡。若其他區域內的大國權力均衡分配，那就代表著該區域不容易形成潛在的區域霸權，如此一來遠方的區域霸權就不用擔心該地區會出現新的區域霸權來與自己競爭。所以一旦其他區域有可能出現潛在區域霸權，遠方的區域霸權不用自己出手處理，他可以透過將責任卸責給該區域的當地大國來牽制潛在區域霸權的崛起(Mearsheimer, 2001, pp. 95)，這即是「離岸平衡」的戰略概念，遠方區域霸權僅有在當地大國無法與崛起的潛在區域霸權抗衡時才會選擇親自出手來進行抗衡，並盡可能的消滅及摧毀崛起國家所帶來的威脅(Mearsheimer, 2001, pp. 94-98)。

五、為何會發生戰爭？

國家間的權力分配會對彼此恐懼的程度造成影響，權力平衡分配與否及國家體系的結構決定了國際關係的穩定性及戰爭發生的可能性，而當中最不穩定之組成結構就是「不平衡的多極」(unbalanced multipolarity)，因為結構內包含了一個潛在的霸主，他擁有巨大的財富與龐大的軍隊能夠輕易地擊敗所在區域的任何一個國家，在加上權力分配的極度不對等，大國間戰略誤判的可能性最高，可能的衝突組合也最多，其所產生的恐懼感最大，最容易爆發戰爭；其次是「平衡的多極」(balanced multipolarity)，在這種體系中不包含潛在霸主，產生的恐懼感較「不平衡的多極」體系要少，各個大國間衝突組合雖然也多，但權力也相對較有趨近平衡的可能，所產生的戰略誤判可能性也會減少；最後引起的恐懼最少的是「兩極體系」(bipolar system)，原因是最強大的兩個大國會持續維持實力的對等，使得國際體系最容易出現權力平衡，衝突的組合最少，所產生的恐懼感最低，大國間戰略的誤判最不容易發生，所以發生戰爭的機率也最低(Mearsheimer, 2001, pp. 69-73)。

六、和平崛起的中國？

在 1980 年代末期針對中國在國際環境上的處境及外交路線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曾提出「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論述，他提到中國應該「善於守拙、韜光養晦、沉著應付、穩住陣腳、冷靜觀察、有所作為、決不當頭」，並於 1992 年 4 月說道：「我們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中國在國際上發言的分量就會不同，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楊開煌，2017 年)而這些原則也中國在過去數十年來累積實力低調發展，這段時間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也逐漸累積軍事實力，在尚未擁有能與當今世上唯一區域霸主國家美國匹敵之前，沒有必要破壞這個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在時機成熟前不需要主動挑釁美國或挑戰他的地位，然而，「中國崛起」這一觀點至今卻已讓全世界所有國家尤其是美國產生警惕且難以忽視，這並非中國不想繼續低調發展，而是現實上已經沒辦法維持，一方面是中國在南海的主權爭議上無法退讓，表明強硬態度的立場，再者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外交戰略使得歐亞大陸朝著一體化的方向前進及在國際的金融貨幣上中國欲擺脫美國的主導而成立各種國際組織等，這些舉措都讓美國不得不提高警覺，韜光養晦的策略接近瓦解，「安全困境」的情形在國際上逐漸發酵，不論是美國在西太平洋或者是中國鄰近海域所進行的防禦性巡航，或者是中國在沿岸周邊所建立的小型前哨基地等，中美雙方自己都認為是為防止權力受到侵犯的防禦性措施，但在中美彼此以及周邊國家的眼中，卻是認為這些軍事力量可能會有攻擊的意圖，遭成各國彼此間的恐懼感增加，發生戰略誤判而導致戰爭的可能性也大增(Mearsheimer, 2014, pp. 122)。

七、美中對抗

在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的首要戰略就是圍堵，聯合中國沿線周邊國家組成聯盟共抗中國，防止中國勢力在亞洲擴散，是避免引起直接衝突的戰爭發生的選擇之一，再者可能的策略還有以下三項：一是預防性戰爭，即在中國實力

追上美國前先行摧毀它，惟中國具有核子武器，在相互保證毀滅的情況下，這並非是一個好方法；二是滲透中國國內製造騷動甚至顛覆政權，不過效果可能較為有限；最後是設法防止中國經濟繼續成長，這是除了圍堵外較為可行且能實際對中國造成影像的方法之一，雖然也會傷害到美國自身及全球的經濟，惟在安全為國家最重要利益的前提下，阻止中國經濟的發展便是必要之事 (Mearsheimer 著，唐小松、王義桅譯，2014 年，頁 450-453)。

近年來中國在國際主要透過經濟上外交來和其他國家打交道，並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貿易聯盟及金融貨幣組織，中國與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的經貿關係都相當密切且占據非常高比重的進出口貿易額度，然而在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之下，一個國家最關注的重點就是如何生存，一旦這些國家面臨到生死存亡危機必須在中美兩方之間進行抉擇的時候，經濟發展在國家生存的面前便顯得沒那麼重要，所以攻勢現實主義認為軍事及政治因素相較於經濟因素對國家所造成的影響更甚，這也使得在中國崛起的態勢之下，中國的周邊國家最後會選擇共同對抗中國，而這些周邊國家與中國關係越密切的同時，他們與美國的關係也會更加密切。

在中美處於安全競爭的情況下，兩國的貿易關係可能會依舊熱絡，雖然仍會在某些議題上合作，但在兩者的本質上卻是對抗的關係，中美是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原因包括：第一是中美爭霸未有明確的地理分界，在這種情況下在亞洲地區許多地區都有可能爆發戰爭，正是因為中美沒有明確的勢力分野，處處都是亞洲的火藥庫。其次是在亞洲地區存在的大國眾多，包含了美國、日本、俄羅斯等，是屬於多極的亞洲，而隨著中國的實力不斷增強，權力越趨不平衡，中國在亞洲也將漸漸成為一個潛在的區域霸主，亞洲地區也就形成一個不平衡的多極體系，在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中，多極比兩極容易發生戰爭，大國間的權力不平衡又比權力平衡的狀態產生衝突更高也更易推卸責任，而當前唯一的全球區域霸主美國所要做的，就是阻止中國成為世界上另一個區域霸主。再者

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興起，不論是在過去中國被世界列強侵略的百年國恥仇恨，還是當代中美處於強烈的安全競爭環境之下，更容易產生出現極端的民族主義進而激發戰爭的可能(Mearsheimer 著，唐小松、王義桅譯，2014 年，頁 460-467)。

根據攻勢現實主義理論之看法，國家會追求權力的最大化，並尋求成為唯一的區域霸權，國家為了生存會根據當前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調整行為模式，在該理論下國際體系處於失衡的多極發生戰爭之機率最高，其次是平衡的多極，兩極體系發生戰爭的機率最低。按攻勢現實主義理論的預測，由於目前的國際局勢近似於多極體系，且中國是一個快速崛起的大國，一旦國際體系的權力變化開始傾向失衡，再加上美國為維護當前身為全球唯一區域霸主之地位，中美之間發生戰爭的機率就會提高。

第五節 小結

在本章節四種著名的國際關係理論當中，可以看到每種理論所抱持的論點不盡相同，但筆者擷取各理論中可能爆發戰爭的關鍵點進行列表彙整分析，比較在不同況狀下，中美關係套用在各種理論中推斷在各個時期不同變化下可能引起戰爭的機率高低作為參考依據，分述列表如下：

一、 權力平衡理論

表 2-1 「權力平衡理論」中權力對比與發生戰爭的機率

	權力平衡時	權力不平衡時
發生戰爭的機率	低	高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 權力轉移理論

表 2-2 「權力轉移理論」中權力對比與發生戰爭的機率

	權力平衡時 (假定崛起國的 不滿意程度高)	權力不平衡時 (假定崛起國的 不滿意程度高)
發生戰爭的機率	高	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修昔底德陷阱

表 2-3 「修昔底德陷阱」中權力對比與發生戰爭的機率

	權力平衡時	權力不平衡時
發生戰爭的機率	高	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攻勢現實主義

表 2-4 「攻勢現實主義」中國際體系結構與發生戰爭的機率

	失衡的多極體系	平衡的多極體系	兩極體系
發生戰爭的機率	最高	中等	最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5 「攻勢現實主義」中相對權力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

	相對權力結構 對本國有利時	相對權力結構 對他國有利時
國家行為	捍衛權力平衡	打破權力平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總體而言，國際關係理論是解釋所有國家於特定國際體系中的某個時機點上，所會發生的一些通則性的現象。可以讓一個國家的掌權者在評估當前的國際體系及國家間權力變化後作為施行決策之參考。本章節探討到了「權力平衡理論」、「權力轉移理論」、「修昔底德陷阱」及「攻勢現實主義」等四個著名的國際關係理論，據此來尋找可以運用在當前中美關係現況的研究理論，從中分析各理論在目前中美關係所能依循的通則性現象以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並在上開各理論中預測未來中國和美國於面對各種情境較有可能爆發戰爭之時機點。

本章的目的是在攸關中美關係的這四個著名國際關係理論中比較各個理論觀點的差異，惟根據在近年中美關係的情勢，可以發現中美雙方在利益上的爭奪，不論是在亞太地區主導權的競逐、經濟貿易上的相互抵制以及中國在外交、軍事、經濟上的擴張等都讓美國認為已經威脅到自身的利益，影響其在世界的統治的地位(利益)，再加上美國在看待新興崛起國家的中國時，可能會受恐懼的情緒所影響，雙方嫌隙擴大以至於對中國所形成的威脅程度產生誤判(恐懼)，最後則是中國要復興中華民族的中國夢；美國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美國夢，雙方國家各自的「自我認同」(榮譽)相互衝擊之下，中美間的局勢發展變化已逐步趨向「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的背景情況。是故，本論文將於接下來的章節中聚焦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並針對「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對於該理論的看法個別深入研究後再加以分析比較。

第三章 「中國官方」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

2011年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提出了將軸心轉向亞洲的政策，讓白宮的重心及資源中東地區移動到亞洲地區(Hillary Clinton, 2011)。當時的歐巴馬總統也說「在過去時間中經歷了兩場沈重的流血及財損戰爭之後，我們美國將會將注意力轉移到極具潛力的亞洲地區上...我們在國內的經濟實力是讓我們能後在世界各地(包括亞洲地區)位居領導地位的基礎。我們對亞太地區的關注也反映出一個事實，就是美國一直且永源都是太平洋國家...經濟奇蹟可以推動一個地區的繁榮，美國人也為此感到高興，但是我們絕不會允許他逆轉，在這裡，我看到了未來作為佔全球經濟成長一半以上且最快速的地區，是美國人創造了如此多的就業機會，所以亞太地區對於實現我的任務至關重要，亞洲將在很大的程度決定未來的世紀將會衝突或合作，以及面對不必要的苦難或促成人類進步的標誌...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美國將與我們的盟友保持密切夥伴關係並秉持著核心原則，在亞太地區及他的未來中扮演更大且長期的角色(Obama, 2011)。」，他提到把「亞洲再平衡」作為他未來的主要外交政策，並將會提高在亞太地區的經濟、軍事及外交的戰略布局，以提升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對抗崛起的中國。

本章節主要是針對「中國官方」對於中美關係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看法進行剖析，以及中國官方認為要如何避免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發生。本章第一節討論的重點是中國當代領導人的觀點，也就是習近平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包括他認為中美關係會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他認為要採取何種作為才能跳脫修昔底德陷阱，並深入研究在目前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潛藏危機下他如何看待當前中美關係的處境，採取何種外交作為等。第二節則是對於中國外交部及其他政府部門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見解，包含中國外交部以及其他政府部門官員的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進行比較。第三節是「中國官方」觀點的特性，探討中國共產黨如何形成現今的中國政治運作模式及影響當

前中國的外交決策，又或者如何造就中國在全世界所呈現的外交模式和看待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態度，並在彙整出中國官方的觀點後，針對在研究過程中所發現中國官方的特別現象進行分析並探討造成影響的原因。最後是小結，統整出中國官方各個看法的差異。

第一節 中國當代領導人觀點

作為中國當代領導人的習近平，他如何看待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更是在探討中國方面的看法中最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他的態度攸關中國對美國的未來政策走向，本節首先要探討的是在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的轉變，習近平自2012年擔任中國領導人以來，對中國國內各項事務進行改革，中國不論是在經濟、軍事及外交上都產生了重大變化。接著闡述習近平的中國夢，實現中國夢是習近平自上任以來一直強調的理想，這一方面是為了凝聚中華民族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對外展現出中國將會復興中華民族重返榮耀之決心。再來是習近平如何來看待修昔底德陷阱，包括他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解釋、認為是否會存在於中美之間及修昔底德陷阱能否破解等看法，再補充他對於外界指稱中國國強必霸之否定，最後是習近平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應對之道，將習近平對美外交想法及政策進行探討及彙整。

一、 習近平領導的中國

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習近平在開幕致詞上提到「兩個一百年」的政策目標，第一個百年是於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二個百年是於2049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習近平上任後，陸陸續續朝著下列四個面向做出改革：一是反貪腐，一開始便雷厲風行地針對中國共產黨內貪汙腐敗的官員進行肅清，並建立自己的威信。二是復興中華民族的榮譽感及愛國情操，三是進行結構上的經濟改革，

以延續中國經濟水平的高度成長。四是重整軍隊，打造中國現代化的軍事部隊，由「強軍夢」來支撐「中國夢」，使中國解放軍能打勝仗擊敗敵人，有鑑於過去外國入侵中國都是憑藉著他們優勢的海權力量，習近平吸取過去歷史教訓進行國防及軍隊改革，在 2015 年 11 月 24 日的《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中，將「軍種主建、戰區主戰、軍委管總」列為指導原則，調整中國解放軍的軍委體制、組建聯合作戰指揮機構、重組領導機構、重劃戰區、健全領導管理（中央軍委，2016 年），縮減陸軍編制及人數裁減並提高中國海軍、空軍的規模及作戰能力，新成立戰略支援部隊、火箭軍及陸軍領導機構，打破中國一直以來以陸軍為最高軍種的軍事地位，同時中國軍事戰略從「近岸防禦」至「近海防禦」接著是「遠海防禦」逐漸發展，解放軍作戰範圍也進一步從「黃水」前進到「綠水」在擴展到「藍水」（范進發，2014 年），中國軍事影響力所及範圍不再侷限於中國本土境內，而是擴張到對周圍海域的進行軍事部署及建設雷達、港口、機場等前哨基地遍布鄰近海域以擴大監控範圍。

相較於前共產國家蘇聯的國家運作模式習近平以下述三項政策導致失敗作為借鏡，他提到：「一是共產黨的內部腐敗，最後名存實亡；二是經濟改革成功前，在政治上社會控制的鬆綁；三是黨解除武裝，軍隊歸於國家所有。」

首先是習近平時期的反腐敗行動，習近平擔任中國國家領導人甫上任以來在面對中共腐敗的「亡黨亡國」的擔憂，在 2013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他提到：「堅決查處領導幹部違法違紀案件，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要堅持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並確實解決發生在民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及腐敗問題。」（習近平，2013 年），其中甚至包括現任、前任中央委員及政治常委等數十名，打破過去「刑不上常委」的態勢，習近平的反貪腐行動讓中國共產黨能夠建立法治、提高中國國內大眾對於黨的支持及認可，降低因官員貪腐而起的民怨，也使他的權力在黨內更加穩固集中並樹立威信。

而後是習近平要思想武裝全民，讓全中國人的思想更加統一，並服從於黨的領導，加強對社會的政治控制，建立「社會信用體系」，這是來自於2014年中國國務院印發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畫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於獎懲機制全面啟用及2020年基本建成，該體系主要目的在規範公共行為，與中國國內視頻監視系統「天網」相連，建立臉部辨識系統及大數據資料分析(國務院，2014年)，監視人民的財務、喜好、想法、交流及網路活動，藉由獎懲機制來監控人民的社會行為，進而達到「維穩」的效果，對於維持當前領導者統治秩序、避免影響各項官方施政的任何社會活動進行全面性的掌控。

二、 習近平的中國夢

習近平的「中國夢」以來，最具代表性的言論即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代表著中國正朝著幾個方向前進，一是恢復中國在亞洲的龍頭地位，二是取回台灣、香港、西藏及新疆等的大中華地區的控制權，三是重新發揮中國在邊境及鄰近海域的影響力，四是贏得世界主要國家的尊重(Allison 著，包淳亮譯，2020年，頁153-154)。

能夠讓十億中國人順從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除了武力統治、思想控制外，最重要的是讓中國人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夠將中國重新站回世界舞台，位居世界的領導地位，恢復昔日的光榮，而要讓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有信心及產生信任，最重要的便是實現習近平的中國夢，中國共產黨必須持續維持每年不間斷的經濟成長幅度、恢復身為中華民族的光榮感及國家的自我認同。李光耀曾說：「中國是不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如果如此，中國會崩潰。」所以過去美國在對應日本崛起所使用的策略，中國不會輕易像日本及其他國家一樣服從美國的所領導的國際規範及秩序，接受美國向他國所導入的價值觀及在國際上的主導地位，「中國希望被承認的身分就是中國，而不是身為西方國家的榮耀會員之一。」(Allison 著，林添貴譯，2013年，頁29)，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

美國已經無法忽視中國的不受控制。在中國，相較於追求政治上自由民主的聲音而言，對於中國能建立在國際上的主導優勢及展現中華民族光榮更受到關切及重視，李光耀還說道：「中國人就要的就是一個復興起來的中國(Allison 著，林添貴譯，2013年，頁41)。」若習近平能讓中國重返榮耀，那麼他的領導地位及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正當性就能繼續維持。習近平說道：「在過去的數千年中華民族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走著不同於其他國家及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這不是偶然，是我國文化傳統及歷史傳承所決定的。」北京大學教授葉自成也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習近平在領導中國上最大的不同在於他能改變中國人的思想，進而激發中國人民內心的凝聚力並藉由中國久遠的文化中開發出不同的想法(狄雨霏，2014年)。

John King Fairbank 曾提到，中國的核心外交政策原則上包含了以下幾個面向：一是要求周遭國家對其自身優越性的尊重及認可；二是在鄰近區域建立主導地位；三是憑藉這些優勢及優越感來發展與周遭國家和睦相處的模式(Fairbank, 1969)。

中國的文明自古以來都是將自己置身於天下的中心，中國即是中央之國，以天朝上國自居，藩屬國都應該向中國稱臣，在古代中國人的空間維度中，「天下」代表的是由皇帝所支配的天地間所有空間，天下概念的是以「天子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為基礎，在中國的「天下」架構裡，「對外」指的並非是「天下」以外的外部，而是意味著「天下」範圍裡的邊緣地帶。北宋的學者石介的著作《中國論》中有提到：「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何新華，2004年)意即在天下之中的就是中國，位於天下的偏遠地區的稱作四夷，中國居中，四夷居外，但仍都在天下的範疇之內。這一觀念在過去被視為井底之蛙，將中土之外都視為蠻夷之邦，也導致清朝末年飽受外國勢力入侵。然而到了現今，中國將自己視為天下中心的觀念不再是像過去一廂情願的想法，而是展現出實際要付諸行動的

企圖心，不僅是國內要服從國家及黨的領導，在對於鄰近國家、亞洲，甚至是全世界，中國都期望著他們能向北京俯首稱臣。

三、 習近平如何看待修昔底德陷阱？

在 2014 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第一次把修昔底德陷阱用來描述中美關係現狀，他對修昔底德陷阱之看法攸關中美兩國未來發展。相較於西方學者在中美關係的框架下，對修昔底德陷阱有著不一樣的解釋。

(一) 習近平認為我們都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新興崛起國家與既有強權間的紛爭

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創刊號在 2014 年 1 月 22 日發表，其中習近平首次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為回應中國迅速崛起，必將面臨和舊有霸權國家爆發衝突之疑慮。習近平提到：「我們都應避免陷入『修昔底德的陷阱』」，「一個強國永遠會追求霸權的論點不適用於中國」、「回顧我們悠久的歷史和文化背景，這不是中國的文化基因。」，在「中國和平崛起」的論調上，習近平基本上是同意於 2003 年時任中國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兼任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主任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的論點，而在面對古希臘雅典與斯巴達相爭的歷史中，習近平還解釋道：「我們應該要團結一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是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間，或是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之間破壞性的緊張關係。」(王楊、張苗鳳，2014 年)。

(二) 習近平認為除非是大國間的戰略誤判，否則世界上本來就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

受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之邀的習近平在 2015 年 9 月 22 日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發表演講，探討如何從新的起點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以及中美

應如何共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習近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擴大培養兩國國民的情誼。歸根結底，中美關係就是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第二，有效且精確地處理分歧。雙方應相互尊重，在出現分歧的同時尋求共識，採取建設性的方法增進了解，盡量把分歧轉化為合作重點，凝聚共同利益。第三，取得利益之唯一途徑就是相互合作。堅持彼此合作才能共贏。第四，對雙方的戰略意圖要有正確的判斷。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就是與美國合作一起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將兩國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行動付諸實行。世界上本來就沒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國彼此反覆之戰略誤判可能使自身形成『修昔底德陷阱』」（紐約時報，2015年）。

（三）習近平主張「修昔底德陷阱」可以破解

習近平在2013年6月於加州安納柏格莊園與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進行中美雙方領導者會晤時，習近平對歐巴馬表明了南海主權、網路安全及朝鮮問題的立場，並提到中美之間基於和平發展、減少對立衝突及強化雙邊關係，應該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而關於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習近平解釋為：「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來為兩國的未來提出有別於中美即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論調之其他看法，而「不衝突、不對抗」，代表著中美必須客觀合理地對待彼此的戰略意圖，化敵為友，並藉由溝通與合作適當處理矛盾和分歧，來取代衝突與對抗；「相互尊重」則為尊重於發展道路及社會制度上各自的抉擇，尤其是在核心利益與關鍵問題的部分，在尋求共同的基礎上同時化解分歧，相互寬容和學習一同進步；「合作共贏」乃雙方要跳脫零和遊戲的思考方式，尋求自身利益的同時要考慮到彼此的利益，謀求自身發展時要力圖一起進步，將雙方利益交織的程度朝更深更廣的方向前進。綜上而言，習近平主要是也闡述了在面對世界新的局勢之下，中美關係必須不斷發展和進步，在中美合作上必須開拓創新，雙方彼此必須相互尊重和容忍。在戰略上從長遠的

角度看待中美關係並朝正確的方向向前邁進，逐步在大國關係中走出新的道路(新京報，2013)。

(四) 習近平對中國「國強必霸」的駁斥

「國強必霸」可以說是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當中一項重要根本立論之一，即一個國家強大後必然追求世界霸權，基於對這個看法抱持著否定的態度，習近平在各種場合對外宣揚對於「國強必霸」的觀點的不認同及批評，他的看法如下：

1. 在 2010 年 11 月習近平尚未擔任中國國家領導人之前，就認為「『國強必霸』的觀點與鄧小平『將在如果中國未來發展了也將永遠不尋求霸權』的承諾不相符，也不符合中國所要實踐的外交政策及中國講究信用與和諧之傳統文化」(蔣銳，2010 年)。
2. 2013 年 11 月 2 日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上解釋與外國使者道：「中國堅持和平發展，永遠不走強國霸權之道路。伴隨中國的發展，中國會更加積極地國際體系改革和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並參與國際事務」(燕磊，2013 年)。
3. 2014 年 3 月習近平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之演說中提到：「回顧過去的歷史，國家需要把握及順應全球發展的潮流，才能要繁榮與發展。否則，它將是歷史所遺棄的對象。如今全球的潮流為何？即是合作、發展、和平以及互惠互利。『國強必霸』之老舊邏輯中國無法同意」(薛濤，2015 年)。
4. 2014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演講中習近平提到：「我們無法承認『國強必霸』之邏輯，中國已經從堅決走和平道路的路線中發展了。而且外國人隨意欺負中華民族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了」(姜萍萍、秦華，2014 年)。

5. 2016年9月3日於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的開幕典禮上習近平提到：「中國將堅持不猶豫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東方文明之精髓及中華民族的歷史基因乃和諧共生。窮兵黷武之路將行不通，國強必霸之邏輯將不再被接受」(習近平，2016年)。

綜上所述，修昔底德陷阱對於中美關係而言，習近平想傳達給美國或甚至全世界一些信念，如同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暨中國國際友好大會在2014年5月15日活動上他的講話，那就是中國的崛起並不追求霸權：「中國的祖先很早就知道的哲理『國雖大，好戰必亡。』從過去到現在，中華民族執著於捍衛國家的愛國主義，而非開疆闢土之殖民行動，且沒有對外侵略擴張；對外積極交往開展通商。...中華民族血液之中並無稱霸世界與侵略他人的基因，『國強必霸』之邏輯中國人無法接受，我們願意與世界人民和諧發展、和睦相處，共護和平、共謀和平、共享和平」(央視，2014年)。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相較於習近平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他曾提到：「中美之間的競爭應當是富有積極意涵與建設性的。我堅信中美雙方有處理好矛盾的能力。大國間特別是美中雙方應該要嚴加管控防止衝突發生。我沒有認同既有強權和崛起大國一定會引發戰爭的『修昔底德陷阱』」。要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中美雙方需要一起盡力來達成，非中國獨自可以完成，若要一同得到破解陷阱後的收穫，中美雙方就必須努力付諸行動。

四、 習近平對修昔底德陷阱的應對之道

在擔任中國領導人這段時間裡，習近平面對諸多中美即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疑慮，於此他於多個場合及時間對中美關係的發展進行論述及對自身角色定位，包括：「中美可以做出有利於世界之大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造福雙方人民和各國人民。」、「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於概念上原地停留。」、「中美關係之主流並非即是雙方

的分歧。」、「中美鬥則俱傷、合則兩利。」、「沒有現有模式與經驗可以用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互利合作之基礎是中美兩國戰略互信。」、「與世界各國包括美國人民之美好夢想相通的就是中國夢。」、「中美兩個大國可以一起共處在寬廣的太平洋當中」(郭偉峰, 2018年)等諸多看法, 本文彙整兩項習近平在面對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要應對之道分述如下:

(一)新的亞洲安全觀

2014年5月, 習近平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 (CICA), 簡稱亞信會議)第四次峰會中提到了「亞洲安全觀」的中國國際戰略概念, 其中包括「可持續安全」、「合作安全」、「綜合安全」及「共同安全」四種新安全觀, 建立一套有別於西方國家的安全觀, 其中他認為: 「可持續性」代表著為了永續的安全, 發展及安全應該並行, 持續的發展就是最大的安全; 「合作」是藉由相互溝通協商來達到國家間及地區的安全; 「綜合」則是安全範疇包含了傳統安全及非傳統安全的領域; 「共同」即對於每一個國家的安全給於尊重及保障。他還提到要隨著時代與時俱進, 不要將想法停留在過去冷戰時期零和遊戲的觀念, 將中國的價值觀及想法轉化為「亞洲觀念」, 展現亞洲的特點, 相信藉由相互合作亞洲人有足夠得智慧及能力維持亞洲的和平發展, 建構「亞洲命運同體」, 強調中國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的基礎上所創造的新架構(中央社, 2014年)。在過去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崛起強權要取的世界各國的尊重及承認, 其中一個要素就是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國際關係理論架構, 藉此來增加自己在國際上的聲量及話語權, 以凸顯自身的價值觀念及利益所向。「亞洲價值觀」也代表著習近平在實現「中國夢」過程中重要之國際戰略思想框架, 也作為中國在亞洲地區和平發展及行動方針的基礎(陸穎, 2014年), 在這個會議中, 習近平更以三個「歸根究柢」, 即「亞洲的事情, 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

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沈旭暉，2015 年)並宣示亞洲國家在這個區域自主性，呼籲美國等西方國家不要插手亞洲事務，中國這些行動這也像過去美國崛起時所遵循的門羅主義模式，而後一步一步地成為區域霸主。

2019 年 6 月，在亞信會議(CICA)第五次峰會中，習近平提到在促進亞洲的發展上，中國創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亞信會議(CICA)、上海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等區域多邊開發機構，將中國自詡為「全球秩序之維護者、世界發展之奉獻者及世界和平之建構者」，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建構新型的國際關係，他在會議的講話內容主要就是提倡中國的多邊主義，包含透過「一帶一路」等的方式，並對外展示中國與其他國家一起維護世界公平正義及國家發展權力的立場，使中國進一步提升在亞洲國家間乃至全世界的號召力及影響力。(習近平，2019 年)

(二) 新型大國關係

「新型大國關係」的觀念於 2010 年由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所提出，他提到中美應該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創造全球化時代不同發展階段、傳統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國家合作共贏、和諧相處、相互尊重之新型大國關係。」，後在 2012 年習近平在擔任中國國家副主席時，他針對中美關係在訪美的過程中向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建議，中美的合作夥伴關係應該不斷的努力發展，以期在未來中美關係能夠演變成 21 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新型大國關係」也列為中國的重要外交戰略之一，該會議的報告中提到：「我們與已開發國家間的關係將進行改善及發展，拓寬合作領域，妥適解決爭議，促使建立長期且穩健發展之新型大國關係。」於此「新型大國關係」更進一步由中美關係延伸到了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的關係。到了 2013 年，

已經成為新一任中國領導人的習近平在面對時任美國國務卿的 John Kerry 時對新型大國關係進行更深入的描述，他說道：「中美雙方合作夥伴關係之戰略內容要不斷的充實，形成一個合作共贏、相互包容及平等互信之新型大國關係道路。」他還表示：「我們應該從中美與世界人民的角度來尊重他們根本的核心利益，創造出古往今來皆沒有的新型大國關係之路，一同努力發展中美合作夥伴關係。」習近平所提的核心利益內涵也表明著在雙方的勢力範圍內應該相互尊重(孫揚，2013 年)。

中美雙方必須共同面對的難題是有的，包括一是發生核子戰爭引爆世界毀滅的可能性；二是恐怖主義的盛行；三是核子武器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WMD)的擴散；四是全球的氣候變遷。在面對這些異常艱難的問題，中美之間就必須彼此分享利益及情報並相互合作，否則將難有成效(Graham Allison 著，包淳亮譯，2020 年，頁 288)。

美國在看待中國所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態度相對較為謹慎並未有特別的回應，僅針對新型大國關係的具體作法應該要用實際行動來展現，而非僅單靠言語來表示。2014 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 John Kerry 說道：「中美有相當多的共同利益，所以雙方應該尋求更積極的務實合作，妥適處理爭議，減少分歧，對美中新型大國關係建設進行推展」(常曉宇，2014 年)。

第二節 中國外交部與其他官方部門的觀點

本節將針對中國外交部及其他官方部門對於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首先第一部分乃是中國外交部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由於中國「外交部」是中國當前執行外交戰略最主要的執行及決策機構，代表中國及其政府對外辦理外交事務，就中國的外交整體布局，針對中國各層面的問題進行協調，並對中國共產黨及國務院擬定外交戰略及政策建議，是故分別探究中國外交部官員的看法進行研究。而後第二部分再加入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官員的觀點，

因為「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及中國共產黨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總稱，其主要職責是制定中國武裝力量及軍事戰略的作戰策略，指揮統一中國的武裝力量，管理及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置、組織、計畫及部屬，是故針對該委員會官員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作出彙整並深入探究，彙整及尋找它們之間的共通性，研究和中國現任領導人習近平的見解上有何關聯，並在第四節與「中國學界」在各自的看法上試圖找出兩者的共識。

(一) 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

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是現任中國國務院黨組成員兼任外交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曾任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中國駐日本大使、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等職務，在中國處理與美國及全世界相關中要外交問題時都可以看到王毅的身影，是中國外交戰略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並針對中國當前政策方針提出相關建議，而王毅針對中美間的修昔底德陷阱，他有以下之看法：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2013年9月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上的演講中提到了如何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大致上與習近平「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之基本架構相同，王毅也針對在過去歷史上有關新型崛起國家必然面臨戰爭及衝突做出解釋，他認為：「現今的世界已經不同於以往，如果一旦發生對抗將是中美雙方皆輸的局面，有鑑於此中美間保持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則，也意謂著對彼此核心利益的尊重，才是中美未來最好發展的下一步(Chang, 2015)。」這也是中國為何要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王毅在2017年3月20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中也提到：「於所有國家的未來皆緊密連結之時空環境中，既有強權和新興崛起國家在彼此利益上已經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一旦產生對抗，將會是兩者皆輸的局面。」有鑒於此，「中美關係並不會進入修昔底德陷阱」(馬文英，2017年)。

王毅在 2021 年 4 月 23 日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與北京的會談中提到：「中國一直以來的種種政策並非為了征服或擊敗他國，而是要讓中國人民的生活可以更為幸福。中國是依靠的不是拓張領土或者侵略他國，而是自己的努力才得以復興及發展。中國歷史長久以來的智慧結晶非『國強必霸』，而是『國霸必衰』。中國從未追求世界霸權，中國與過去傳統大國的路徑不一樣，堅決與世界各國合作共贏、和平相處，要走出一條和平崛起和平發展之道路」(牛鏞、胡永秋，2021 年)。

(二)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是分管歐亞地區事務、公開政務及日常外交業務辦公廳及工作的副部長，曾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是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而樂玉成在看待中美間的修昔底德陷阱，他所提出的看法如下：

2019 年 7 月在第八屆世界和平論壇會議上，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提及：「人類要持續透過歷史演進的過程吸取經驗，不要反覆陷入同一陷阱，若非如此將演變成「歷史宿命論」。所有國家在全球化的時代中所有利益都交織在一起。如果中美雙方爆發戰爭，將會對世界各國造成毀滅性的破壞。就在近日多位美國專家共同提出的文件中，提到美國對中國的敵意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古希臘時期之「修昔底德陷阱」無法解釋中美關係。當今大國之間的關係比兩千多年前要複雜得多。他認為，「中美兩國有充足的智慧來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徐夢溪，2019 年)。

2021 年 4 月 16 日美聯社大中華區新聞訪問樂玉成，面對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各層面的快速崛起，他提到：「中國不論未來如何發展變化，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不擴張、不稱霸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會改變。...我們強而不霸、富而不驕。我們相信國霸必衰但並不認同國強必霸。...為了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不是基於取代或勝過別人的心態而努力發展，也不是要爭奪世界的主導權，而是要使中國人民得到更好的生活」(藍孝威，2021年)。

(三) 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許其亮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許其亮，被視為當代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最信任的軍事將領，再加上他身為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副主席身分及中共權力最高的中共第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25 人之一。而許其亮對於修昔底德陷阱，他以下的見解：

許其亮在 110 年 3 月 5 日於北京所舉辦的人大會議中提到：「軍方務必盡力快速提升自身的實力，以因應邊界動盪及修昔底德陷阱。整體實力建構以及內部凝聚力和團結是最重要的。若是實力足夠，那麼你將擁有無敵的力量且保持長期的穩定狀態。」他還提到：「我們需要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打下堅固的基礎，在作戰能力以及作戰方法方面更加精進。」許其亮還提到中國的 GDP 會在短時間內超越美國變成世界上第一經濟大國。目前，中國已達到美國的 70% 的國內生產總值。另外許其亮眼中的邊界動盪指的也包括中印的邊境衝突及南海主權爭議問題。

這些言論也被視為中國近期不斷增加軍費的原因，在 2021 年中國軍費第一次超過 2000 億美元，達到了 2090 億美元，較前一年增長了 6.8%，也是持續六年了的成長，這是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第二大的國家軍費規模，相較於第三名的印度國防軍費 657 億美元，更是有相當大的一段差距。中國國防部也再次提到「保留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之選項，不放棄使用武力的承諾」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在 110 年 3 月 7 日回應面對軍費成長的議題時聲稱：「中國在促進經濟實力及國防能力方面要一起成長」，另外還提到「軍強才能國安，強國必須強軍」(邱立玲，2021 年)。

第三節 「中國官方」觀點的特性

在本節第一部分首先是要探究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對於中國不論是在政治、經濟、軍事及外交上相較於過去均有重大的轉變，中國共產黨也成為了中國政治的核心，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就是中國的政策，基本上也幾乎代表了中國的一切，鮮明的黨國特色與當前最強大的美國之民主政治形成強烈的對比，也因為中美雙方的政治體制有著根本上的不同，衝突也容易因此而發生，本文首先便就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尤其是在習近平任內該黨對於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及變化進行分析研究，以及探討中國共產黨如何影響及造就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及外交模式，以及如何塑造出中國在國際上的外交模式及其在看待修昔底德陷阱的態度。第二部分是在探究中國官方對於修昔底德陷阱觀點的過程中，所發現的一些呈現在「中國官方」的特別現象，並針對可能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進行論述。

一、 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影響

有別於鄧小平的黨政分離，習近平採用毛澤東時期「黨領導一切」的國家管理體制，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將此原則列入黨章，並在2018年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習近平，2018年)加入。

接著為堅持「黨指揮槍」原則，毛澤東在1927年八七會議提出的「槍桿子出政權」(中國共產黨新聞，1927年)及1938年《戰爭和戰略問題》的文章中所述「黨指揮槍，絕不容許槍指揮黨。」之基本理念相違背(毛澤東，1938年)，全國武裝力量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來領導，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有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由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發展觀、科學及

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的人民軍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2018年)是由中央軍事委員會來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軍事武裝力量，其中主席就是習近平，他還成立若干領導小組並擔任小組長，造就以習近平作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袖的領導體制，建立了習近平在黨中央唯一的領導核心地位，並將國家黨政軍權力牢牢握在手中(曹焱、謝磊，2017年)。

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由對其國家內部的管理演化而來，中國人認為國家內在的儒家文化精神潛移默化地展現在外交手段上，並以此來維繫他的國際秩序觀。儒家精神中，使用武力是最後手段，《論語·述而第七》說道：「子之所慎：齊、戰、疾。」(孔子弟子和再傳弟子，論語)意即打仗在孔子的一生中，是必須謹慎再謹慎的其中一件事。對中國軍事發展影響深遠且被奉為兵家戰略經典的《孫子兵法》中也有提及，《孫子兵法·火攻篇》說道：「...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孫子兵法·謀攻篇》：「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與孔子慎戰的思想不謀而合，戰爭並非最好方法，而這並不代表著中國就不為戰爭做準備，在《論語·子路第十三》中同樣提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說明的就是訓練的重要性，而這也與中國共產黨「強軍目標」彼此呼應，在2013年3月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講話中說道：「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是建設一支作風優良、能打勝仗、聽黨指揮的人民軍隊。」(國防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2013年)確立了習近平的強軍思想以及中國未來不容忽視的軍事實力。

受到儒家精神的影響也投射在中國的國內社會中，「家國天下」的概念深植中國人民心中，國家政治視同血緣親屬關係，一如儒家思想的「君父、臣子」的階層社會(金香花，2019年)，《孟子·萬章下》中說道：「位卑而言高，罪

也。」，儒家著重長幼有序、尊卑有別、安分守紀的社會運行模式，如此中國國內具有位階分層而非人人平等的內部治理也反映中國在國際社會有階層的外交模式，這些流傳千年至今的思維仍然普遍存在當代的中國人心中，中華民族社會是推崇民族主義及注重自身文化，在中國皇帝是一切權力的巔峰及至高的存在，其他國家都只被視為是附屬關係，在過去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數千年來中國可以說是長期稱霸亞洲，是亞洲所有政治、經濟、文化的最核心地區，周遭國家也受到中國的巨大影響，在政治上屬附庸地位向中國朝貢，這也使得在中國的領導人眼裡看來，「中國是天下的中心，萬邦來朝。」是天經地義的自然現象(Kissinger, 2014)，因為過去千百年來就是如此。這樣的階級制度移轉到了現今的中國外交上，中國所運用的並非是軍事上的武力征服，主要是透過文化滲透及建立出一種大國的姿態，吸引其他國家去隨從，而中國方面也會對臣服自身的友好國家施以大量的貿易優惠。

二、「中國官方」在看待修昔底德陷阱的特別現象

在經過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針對「中國官方」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做出彙整後，可以看到「中國官方」觀點的特性在看待修昔底德陷阱多半是抱持著否定及不認同的態度，有鑒於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這類的議題對於中國官方而言是相對較為敏感的議題，除了中國領導人本身或者執行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決策者外多半是避而不談，是故呈現出一種特別的現象，就是相較於中國學界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眾多的討論及論述，中國官方面對這些議題不論是提出看法的人或者是其所發表的公開言論會顯得略為稀少，似乎有意無意的在刻意避免提到這類的相關問題，筆者探究造成這種現象可能的原因有三：

(一)中美間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爆發戰爭的疑慮造成中國周邊國家甚至世界各國的提防及擔憂

在中國周邊首當其衝的鄰近國家在意識到中國未來可能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他們所想到的可能是 Mearsheimer 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所提及的擔心是否會被鄰近的強大中國併吞，進而轉向支持地處遙遠的美國一同對抗中國的崛起。而歐亞大陸等其他國家在看待中國對外提供的金融援助及協助基礎建設的優惠外交政策同時，也可能會增加提防中國是否為了擴張自身的影響力而別有意圖的疑慮。

(二)「中國官方」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對中國而言就是一個不利的議題

這個理論的假設一開始就讓中國身陷進退兩難的局面，要不就是中國不要繼續崛起，停止發展；否則若是中國繼續崛起就可能引起當前世界霸主的美國恐懼而爆發戰爭。如同陳村富所言，「修昔底德陷阱」其實是假借修昔底德所設的「Aillson 圈套」，是 Aillson 所偽造來藉以讓世界「把焦點著重在中國的崛起，以及這對於美國和世界秩序所造成的衝擊」（陳村富，2020 年，頁 363），這也是「中國官方」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習近平從一開始就直接提到「除非是中美雙方戰略誤判，否則中美之間本來就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原因，中國想要開創一條新的道路，也就是習近平所提到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從這個由中國所發想的全新且有利於中國的立論點著手，企圖避開中美權力競爭的此彼消長下可能面臨的危險。

(三)「中國崛起」導致美國喪失全球霸主地位的可能性增加，「中國官方」不願這類議題在國際上尤其是美國面前一再被提起

因為不論是中國當代領導人習近平或者是中國外交部及其他政府官員，他們在面對中美間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態度，最主要向世界尤其是美國宣示並強調的就是「中國不會稱霸」，中國愛好和平的民族就算強大了也不會對外

侵略或征服他國等。基本上，「中國官方」在看待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口徑幾乎一致，他們所要表明的就是習近平所說的：「中國沒有追求霸權的基因，我們都應該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第四節 小結

在現今的世界中各個國家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環環相扣，美國與中國也是如此，經濟貿易的繁榮與國家間的和平共存共榮，然而一旦戰爭發生，對於經濟的毀滅程度讓人難以接受的，有別於國家間避免兩方使用核子武器的軍事戰略思想機制「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恐怖平衡。這一「同歸於盡」的概念同樣能運用到當今各國間高度經濟依存的國際社會上，形成新的一種「相互保證經濟毀滅」(Mutual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 MAED)型態，兩方都要盡量避免戰爭以防世界經濟的全面崩潰，一旦發生戰爭對國家經濟及社會所造成的傷害絕對遠大於戰爭所帶來的任何益處，然而這也要雙方的領導人及各自的官方政府間對戰爭所引發的後果具有相同的共識，美國是中國貿易出口總額最高的貿易夥伴，而中國是持有美國國債規模最大的國家，美中雙方對戰爭所要付出的成本及代價的意識至關重要，以至於理解到戰爭是一個不可容忍的選擇。

在本章節分析彙整中國當代領導人、中國外交部及其他官方部門的觀點後，筆者分別針對中國當代領導人習近平、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副部長樂玉成及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許其亮的看法的重點分述如下：

(一)中國當代領導人習近平

1. 中美雙方都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新興崛起國家與既有強權間的紛爭。

2. 中國的崛起並不會追求霸權，中國沒有這種文化基因。
3. 若不是大國間反覆的戰略誤判，否則世界上本來就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
4. 修昔底德陷阱可以破解，破解的方法就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其意涵為「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二)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

1. 中美一旦發生對抗，是兩者皆輸的局面，對彼此核心利益的尊重，才是中美關係未來最好的發展，因此中美關係不會進入修昔底德陷阱。
2. 中國從過去到現在的所有政策並非為了征服他國，而是為了中國的復興和中國人民生活幸福，中國歷史的智慧結晶並非「國強必霸」，而是「國霸必衰」，中國從未追求世界霸權。

(三)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

1. 古希臘的修昔底德陷阱無法解釋現在的中美關係，因為現在世界的局勢比過往都還要複雜，中美有足夠的智慧來克服修昔底德陷阱。
2. 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不擴張、不稱霸，相信國霸必衰不認同國強必霸，中國並不是要爭奪世界的主導權，而是要人民過更好的生活。

(四)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許其亮

1. 中國軍方必須盡快提升自身的實力，以因應邊界動盪和修昔底德陷阱。
2. 一旦國家實力足夠，那將能擁有無敵的力量且保持長期穩定的狀態。

原則上，「中國官方」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整體而言就是「習近平」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中國官方」在看待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述不論是在認定上或者尋求突破的方法本質上都一樣，也就是習近平所認為的觀點。



第四章 「中國學界」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

筆者從新興崛起國家學者的角度來看待自身國家當前所面臨的國際處境，藉由蒐集及彙整相關學者的資料，深入了解在中國國內學者對於中美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以及研究當前中國當前之外交戰略及如何來應對在亞洲甚至國際間所遇到的難題並尋找如何避免中美發生戰爭的解決辦法。本文首先依據在 2020 年中國北京市內各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排名中來挑選在國際關係領域最具代表性的學校前三名，再從這三個代表性學校國際關係學院內的師資中選擇最具有民間影響力且有言論曝光度的知名學者言論及著作來納入本論文的研究分析，以期能發掘有別於西方國家中國際關係領域學者的看法來探討中美關係的議題。

在 2020 年中國北京市內各大學排名中，國際關係學院排名前三名的學校分別是：第一名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第二名是「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第三名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大學生必備網，2020 年)。本章節將從中選擇並分別探討各該學校內最著名國際關係學者的論述來進行分析研究，其中包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王緝思、「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閻學通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金燦榮等 3 位中國著名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挑選這 3 位學者的原因不外乎是這 3 人在中國只要是提到國際政治及中美關係的相關議題或者當前中美互動突然發生重大變革時，基本上中國各家新聞媒體及學術期刊都會邀請他們發表論述表達他們的看法，並於現今資訊流通快速的網路中都可以輕易地搜尋到他們的文章及言論，在中國社會上具有相當大的民間影響力；再加上該 3 名學者各自也都分別身為兼中國官方的決策機構之顧問或委員等中國政策幕後的重要諮詢對象。基於如此，本論文在提到「中國學界」對於中美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

就選擇在中國著名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的王緝思、閻學通及金燦榮這 3 位權威性的學者進行研究。

本章節將再透過蒐集在中國國內擁有崇高學術影響力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憑藉著其在中國被視為最頂尖的智庫及其身為中國的複合型國際戰略與安全問題研究及政策諮詢機構，是中國最有名的國際關係研究機構，研究領域包括世界各國、國際戰略、世界軍事、經濟、政治及外交問題及全球與區域安全問題等，加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是將研究成果以研究報告的方式提供給中國當局進行決策之參考，並在民間出版學術刊物，在中國社會亦有相當的能見度，剖析「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在中美關係問題及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見解並進一步探討中國官方對中美關係可能採取的態度及相關的作為，而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這個中國當前國內第一的智庫中，本論文挑選該研究院的現任院長袁鵬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袁鵬是在國際關係領域的著名學者，在中國國際關係領域上有著重要的學術地位，在中國社會中他的論述及觀點具有相當的能見度，而且他所做的研究及報告會提供給中國政府相關部會作為中國對外制定政策及國際關係問題的學術研究支持，對於中國政府在面對中美關係及國際問題決策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第一節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王緝思的觀點

曾任中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及中國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現任「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的王緝思教授，同時兼任《中國社會科學》、《全球亞洲》及《美國利益》等期刊之編委、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解放軍國防大學兼職教授、中國改革開放論壇副理事長、中國國際經濟關係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及中華美國學會會長等職務。在 2012 年獲選美國雜誌《外交政策》百位的年度思想家並排名第 73 名，為中國著名國際政治及美國問題的

學者，他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包含國際政治理論、亞太安全及美中外交關係等，曾出版《文明與國際政治》、《高處不勝寒：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與世界地位》及《國際政治的理性思考》等國際政治著作，並撰寫過〈From Paper Tiger to Real Leviathan. China's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9〉、〈「遏制」還是「交往」？評冷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美國對華政策中的「戰略大三角」〉及〈美國外交思想傳統與對華政策〉等論述中美關係的相關論文，而王緝思針對中美間的修昔底德陷阱，他有以下之看法：

一、中美關係有無可能發展成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之間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個問題於國際間引起廣泛的討論，這代表著新興的崛起大國一定會挑戰現有霸權國家，導致戰爭無法避免。而這是古希臘的歷史學者修昔底德所提出之一種國際政治現象，在兩千多年前的斯巴達與雅典所爆發的戰爭中，雅典在斯巴達心中所產生的恐懼是造成戰爭發生的重要因素。而如今同樣的現象可能再次發生，可能會因為中國的崛起造成美國人的恐懼，從而導致中美之間長期的戰略對抗。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也曾向美國表明：「我們都應該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國並不適用於強國一定會尋求霸權的主張，中國並沒有這樣的行動基因。」

王緝思 2019 年 6 月 15 日在由新民報社所舉行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美關係走向何方」的演講中，提到當前的中美關係有別於過去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世界上國家的貧富差距擴大，民粹主義盛行，尤其是在前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他的支持者多半是藍領階級的勞動者，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中政策越是強硬，越容易激發這些美國民眾的愛國心而取得認同。中美關係也從過去的合作競爭關係轉變為美國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戰略目標，對中國的內政及外交進行全面的攻擊與壓迫，這現象可能已經無法逆轉(王緝思、黃仁偉，2019 年)。

Graham Allison 把國際關係描述為一場權力鬥爭，因為意識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遠超過過去的「大國政治」理論，這危險是在代表著舊有強權的美國和崛起國家的中國之間可能發生的致命衝突。他不僅用 Samuel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概念來比較中國與美國之政治價值。Allison 還認為：「對美國人來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應當維護人民之權利並使其繁榮成長。即正當的合法政府只能是民主政府。」他還提到：「這個觀點大部分的中國人並不這麼認為，他們反倒覺得施政表現才是延續政府合法性的依據。」並表示：「在中美展現在國際上的基本政治價值觀也有著天壤之別，美國人認為，人民心之所向就是民主與人權，以美國自身作為模範，讓世界各國效法。」然而中國的想法截然不同，北京希望向世界展示提供解決全世界人類問題的新選擇及方案，那就是代表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國家制度(王緝思，2019年)。

王緝思認為 Allison 提到一個正確的觀點，這種可能使中美陷入混亂的漩渦是因為兩者的價值觀衝突及實力競爭所引起的，中美如果在利益及政治價值觀上無法取得共識，就更有機會變成長期的戰略對手(王緝思，2019年)。

二、分析中美兩國因應修昔底德陷阱的外交戰略變化

王緝思提到美國對中關係的轉變主要是從 2017 年開始，在美國在當時川普政府之領導下將中國看作是主要之戰略競爭對手，這在 2018 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中已有明述，並對外誇大渲染中國對世界各國的安全威脅，針對中國的內政及外交政策的目的提出懷疑以及進行批判干涉，聲稱要對中國發起全面的戰略對抗。在具體行動上，美國制裁華為公司、發動貿易戰阻斷雙方人員來往及技術交流，在太平洋地區尤其是南海區域增加軍事佈署，打著人權口號干涉中國內政等，這些行為是過去所沒有的，呈現出一種失衡的態勢，這也就代表這美國的對中政策發生了根本上的「質變」(王緝思，2019年)。

(一)美國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反應

自 1970 年代初期北京與華盛頓逐漸友好，中美建交的 40 年來兩國都於經濟及安全上得到了非常多的利益。同時，兩國人民之間的互動更加深入，這反映在兩邊的人道主義、技術以及教育的交流拓展上。就在不久之前，橫跨太平洋雙邊的經貿往來、文化交流和觀光業更佳的頻繁交流看起來是勢不可擋的。

然而王緝思認為中美關係於 2017 年及 2018 年經歷了劇烈之轉變。其中在中美貿易上的紛爭最引起世界各國的注目，然而這些憂慮不只存在經濟層面上，而是已蔓延到中美之間的所有層面。川普政府公開的幾份正式報告把中國視為美國的戰略對手及「修正主義國家」，這代表著美國政府在中美建交以來所採取之對中政策相較於過去發生了急遽的變化(王緝思，2019 年)。

在美國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盛行，讓 2017 年川普當選了美國總統，這顯示美國人開始強烈抵制傳統政治體制下之多元文化主義的基本價值觀。當時政治分化已經改變了美國之政治格局，造成更加嚴重之意識形態差異。但是儘管如此，美國的價值觀與中國的有著本質上不同，即便在如此分裂的狀況下，美國社會菁英與政客依然存在團結彼此的這些根本價值觀。在美國，人身自由至關重要，對於專制集權的恐懼以及推崇分權制衡、民主制度、自由市場經濟及有限的政府等仍然是美國國家運行最重要的基本原則(王緝思，2019 年)。

他認為這些美國價值觀也反映在美國對中政策中及美國的政治原則中。一如基於經濟利益下稱中國的經濟模式為「國家資本主義」和研究領域為「竊取技術」等。在安全層面基本價值觀上，航行自由及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為美國的核心安全利益。中國社會菁英與官員無法接受本身的價值觀遭受美國的批評，也沒辦法信服美國所謂的政府僅是在經濟及社會需要時發揮適當的功能即可的政府運作模式(王緝思，2019 年)。

其中一份文件是美國 2019 年的《國防授權法》（201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該法案在 2018 年 8 月在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決議通過，並由當時的川普總統簽署，其中內容將中國定調為國際上戰略競爭對手並聲稱中國「企圖根據其專制模式進行破壞行為以對美國與它的盟友之安全構成威脅。」有鑑於此，《國防授權法》使得美國當局要訂定一套完整的對中戰略，以在國際上對抗對中國之政治影響力、經貿手段、網路通訊及各項基礎建設、技術發明和軍事佈署(王緝思，2019 年)。

伴隨中國之綜合國力提高，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之轉變，王緝思分別透過以下四個面向進行探討：

1. 爭奪國家的權力及地位

在修昔底德陷阱理論中，現有霸權國家會因為恐懼而向新型崛起大國發動戰爭，這就是為了爭取成為該區域的唯一霸主，所以中國實力及地位相對於美國逐漸的增長，勢必引起美國的憂慮及提防，為防止中國的超越，美國便會在經濟、政治、制度及價值觀等方面進行打壓，在對美國的霸權構成威脅之前全力遏制中國的成長，如同 Mearsheimer 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所闡述的，中美競爭的本質就是零和遊戲。中美的大國之爭也可能演變成像過去歷史上雅典崛起的力量在斯巴達心中形成不可抹滅的恐懼進而引發伯羅奔尼撒戰爭這樣的悲劇(王緝思，2019 年)。

2. 價值觀與制度的競爭

近年來，不論是在政治制度上中國已經幾乎不可能走向如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所期望的民主道路上，再加上美國的自由市場始終無法接受中國經濟由國家所掌控的國家資本主義市場，以及中國與美國的文化及制度上截然不同，各自的民族優越感盛行，加上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催化之下，雙方都各

自形成了強烈的意識形態分歧，中國重視團體性與集體的安全，與美國重視個人權利的本質上不同，復興中華文化的中國夢以及讓美國再次偉大之美國夢所產生的彼此價值觀相互衝突。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外交政策下吸引眾多開發中國家像中國靠攏，形成另一種有別於華盛頓共識下民主政治及意識型態的模式，再加上成立亞投行及亞洲貨幣基金企圖改變過去由美國主要的國際金融貨幣秩序，這都一再挑戰美國身為當前世界霸主的地位(王緝思，2021年)。

3. 利益的競爭

利益的爭奪主要是針對的經濟利益的競爭，在美國的眼中，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逐年不斷攀升，彼此不對等的進出口貿易額度差距過大，美國當權者認為要改變這種吃虧的現象，迫使中國開放更多市場以獲取更多的利益(王緝思，2019年)。

4. 美國國內政治的競爭

隨著中美各自國內的民粹主義的增加，民族間的矛盾間接擴大了中美在國際上的矛盾，造成政治極化的態勢，將各自的失敗過錯都推諉於彼此，美國當權者的對中強勢政策也成為了選舉中影響支持度的重要關鍵，為強調自身的優勢不斷給予中國棒子強行祭出各種制裁，藉以拉攏美國人的選票擊敗對手(王緝思，2019年)。

因為中國的崛起，美國為防止中國趕上自己，上述的前兩個面向所造成的影響程度就會加深，導致競爭惡化，彼此間的敵視增加，從而使得美國對中政策更加激烈、更具敵意(王緝思，2019年)。

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間，中美兩國的族群及文化的差異更是反應在各自的應對方法上，一如在疫情爆發時，美國認為中國政府對於其國內人民便進行嚴格控制，包括強制戴口罩、嚴格的旅遊禁令、居家禁令、嚴密監視系統及人員

控管等政策，這是為了公共安全而嚴重損害了個人的權益；反之，中國媒體批評批評美國戴口罩及抱持社交距離抱持質疑的態度，認為侵害人權，反而為了維護經濟市場的利益及就業率而犧牲了人民的性命，這些文化社會的不同也形成政治上的歧異(王緝思，2021年)。

王緝思還提到中美的文化差異造就了「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現象，這代表著一群人會形成一種排外的政治及社會陣營，而這群人是透過身份與認同來區分與其他團體的定位。這種現象在民粹主義激化的狀況下會傾向將過錯卸責於外部，也由於中美兩國各自來源於不同的文明，抱持著比國家階層更高的民族認同，美國代表著整個世界的西方國家社會的價值觀、民主制度、自由市場經濟暨等；中國則代表著全體中華民族的領導者、共產主義社會、社會資本主義的維護者。在「身分政治」的影響下中美都希望可以於國際上得到更高的權力及地位(王緝思，2021年)。

(二)中國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反應

王緝思說道在中國，通常將國際關係視為是國家利益，尤其是在全球化時代下的經貿互動關係來斷定。中國官員及國際關係評論者一般認知是「中美之間的彼此紛爭小於雙方的共同利益」，在最近十年中，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額也被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額給超過，也超過了美國與任何歐洲盟國之間的雙邊貿易額。要謀求「互利共贏」，「和平將互惠互利，鬥爭將導致失敗。」，在過往互動中，中美在經濟及安全等各個面向都取得實質的利益。

於國家利益層面中，經濟與安全利益歧異過大的結果則在中美關係間形成了一個的難以解決的難題。兩國之間的力量平衡逐步倒往中國方向更進一步推進了中美間的地緣戰略競爭。而日益明顯的政治價值觀差異可能是利益衝突外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透過世界的歷史可以看到，除了相同之國家利益，要加強國家之間的合作在政治及社會之價值觀上也要相同。若兩國之間的衝突擴大，很有機會是因為兩個國家的價值觀產生了衝突。一如軍事衝突的危險從來就沒有在美日雙方的經濟摩擦中出現，因為相當比例上是取決於兩者相近的政治價值觀與社會制度。美蘇冷戰則是在美國政治思想家 Samuel Huntington 提出的《文明衝突》一書中提到，美國與蘇聯除了地緣戰略競爭之外，還包括了各自的意識型態在全球範圍內的較勁。非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單就其物質利益來解釋，在國際政治裡國家間的文化、宗教及思想更是的重要因素。就算今日中國與俄羅斯的貿易額遠遠不及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額，但是北京和莫斯科關係緊密的主要羈絆就是在國內政治之中都要防止西方意識形態的入侵。

在 2017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新的指導方針被加入了黨章內，即是「習近平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提到：「黨是最高政治的領導層，中國領導人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中國領導人並不認同「走錯誤道路及任何放棄社會主義之意圖」，這說明的就是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在中國的政治模式是「黨領導一切」。

三、中美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解決之道

王緝思認為目前中美間關係是因為兩國經濟和安全利益的嚴重分歧而面臨嚴峻的挑戰，而政治價值觀的衝突導致了更嚴重的相互抗衡。中美應該在下列兩個部分進行加強：第一個是中美對於相同利益的維護。其次，為尋求解決之道，那些注重中美雙方人民包括當局者應該更加注重兩者間政治體制與價值觀不斷擴大之鴻溝(王緝思，2019 年)。以避免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美國的對中政策，不論外交戰略、軍事佈署、經濟往來、政治交流及人員互動等相關政策均由「量變」轉變為「質變」，雖然難以回歸以往既合作又競

爭的互動關係，但中美關係的「質變」目前看來尚未發生，彼此都還是守著各自的界線，維持著本質上鬥而不破的穩定、合作及協調之基調，但中美關係的未來還是要積極尋找並調整可能動搖中美關係的關鍵要素，避免中美雙方陷入萬劫不復的失控局面(王緝思，2019年)。

中美關係中需要積極面對的關鍵要素其中之一就是中國對美國的政策穩定。與美國進行戰略對抗並非有利於中國長期的國家利益，中國應該堅持與世界各國包含美國在內在貿易關係及技術領域等方面持續合作，就算華為被美國封殺，也應該持續與發展多方之合作關係，而非與美國斷絕往來，要堅持合作並持續招攬世界各國的人才，中國也不需要因此去封鎖蘋果公司。美國對外向世界各國強調中國崛起的威脅同時，中國更應該加強與這些國家交流互動，就算美國阻斷與中國的交往，中國反而應該擴大接觸力道釋出善意建立信任，而非與美國較勁強出頭(王緝思，2021年)。

中美的戰略競爭可能轉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災難，中美之間相互加徵關稅可能使原本已經開始不穩定的國際經貿體系變得更加脆弱，世界許多國家也預見可能兩極對抗的可怕未來而選擇與中國繼續發展友好的關係，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外交政策、5G 通訊的基礎建設等建立了良好的根基讓他國願意支持中國，也有部分國家能認同在相對應的實力上中國在國際議題上應取得更多的國際聲量。在中美 40 年邦交基底上，深植於美國社會美中關係不會就此瓦解。一旦中美雙方的激烈競爭告一段落，美國就會發現過去抵制中國的政策所得來的比失去的要多很多，隨著大環境的改變，屆時美國國內就會有較大的聲音來制止美國政府的政策重蹈覆轍(王緝思，2019年)。

美國對於中國政策的質變，王緝思認為已經是正在進行中的事，中國務必做好萬全準備來應對美國各方面日益加重的打擊及對可能發生的地區衝突機先掌握，並透過在不同領域、不同階層各種官方及非官方的協商或會談中彼

此交換意見，加強交流互動，在美國僅存的政策彈性中爭取空間來化解矛盾(王緝思，2019年)。

促進中國國內的改革開放，讓中國經濟成長達到高水準及讓人民對生活感到滿意，才是能夠維持中美關係穩定及解決貿易衝突的最佳戰略。

王緝思認為，為避免中美雙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悲慘結果，中美應該朝兩個目標努力前進。第一是中美必須維護共同利益。切斷中美在技術交流與經貿關係的連結，對雙方乃至整個世界都是沒有好處的。在中美兩國共同針對全球議題，包括氣候變遷、對抗恐怖主義、移民問題和非法毒品等方面進行合作才是更好的互動模式(王緝思，2019年)。

第二是著手處中美在政治價值觀和政府體制間與日俱增的歧異，並找到解決之道。兩國人民必須從長久的角度來觀察，尋找共同的現實利益及精神基礎，使兩國不至於走向毀滅的道路(王緝思，2019年)。

第二節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閻學通的觀點

現任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中國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教授及博士生導師，是中國著名的預測國際情勢的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學者，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對外政策、國際關係理論、國際形勢發展以及大國崛起等。在2012年獲選為美國雜誌《外交政策》全球百大思想家。他創立了「道義現實主義理論」的國際關係理論，主要的論述包括「雙極論」、「制度虛偽論」及「反分裂法」等，倡導科學的預測及研究方法，認為國家利益的起始點就是現實主義，他出版的著作包含《國際政治與中國》、《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及《下一個十年：全球變局大預測》等，並同時兼任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亞太學會理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和學術交流基金會理事、中美友好協會理

事、國防大學兼職教授、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會理事、中國聯合國協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協會理事、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理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中日 21 世紀友好委員會委員、中華美國學會副會長及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等職務。學者閻學通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如下：

一、中美關係有無可能發展成修昔底德陷阱？

有關中美關係，哈佛大學教授 Allison 用「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來警示中國和美國發生戰爭的危險。日經新聞網（日經中文網）於 2018 年 3 月 6 日訪問閻學通，對此他提出了不一樣的想法：

他認為，第一件事必須弄清楚「陷阱」之意涵。修昔底德陷阱討論了一個例子，原始的霸權國斯巴達和新興國雅典陷入衝突，最終發展成戰爭。如果說「陷阱」意味著無法避免戰爭，那麼他就不同意 Allison 教授之觀點(高橋哲史，2018 年)。因為現今中美之間不會爆發戰爭的危險，之所以戰爭不會爆發有三個原因：

- (一)兩國都擁有核武器。核武器的存在使得雙方不容易發生戰爭，在冷戰期間，無論雙方多麼對抗，美國和蘇聯皆無演變成全面的戰爭。
- (二)全球化之發展。相較於過去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期間的情況，不同的是雙方人民之間來往的幅度及頻率已大大提高。隨著中美兩國跨國婚姻的大量增加，這場戰爭無法贏得兩國人民的支持。
- (三)中國和美國皆不願擔任全球領導人。不同於冷戰期間，美蘇會試圖成為各自資本及社會主義不同陣營之領導人。而如今若是承擔重任中美雙方都會擔憂這將對自身國家的經濟成長產生衝擊。相反，彼此會互相指責。因此，閻學通認為，中美之間不僅沒有戰爭，而且也不會有冷戰(高橋哲史，2018 年)。

中美關係的實質是競爭。新興大國不可避免地會與原來的霸權競爭。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日趨激烈，這是合乎邏輯的。再過去由於日本與美國的經濟規模快速接近，在 1980-1990 年間雙方的經濟摩擦變得越演越烈。當時的日本由如現今的中國，經濟實力和美國的差異逐漸減少。如果不重新擴大差距，將難以緩解摩擦(高橋哲史，2018 年)。

閻學通在 2016 年 4 月 18 日發表的題為《大國的崛起-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與戰略選擇》的演講中說：因為核武的存在，與過去歷史上其他新興大國相比，即使中美雙方關係為結構性零和遊戲，處於「霸權國」與「崛起國」的矛盾關係，中國面臨「最少的」戰爭威脅，也是因為核武，「修昔底德陷阱」不會出現在中美雙方關係中(閻學通，2016 年)。

二、分析中美兩國因應修昔底德陷阱的外交戰略變化

閻學通於 2018 年 2 月 6 日在《世界郵報》和《華盛頓郵報》的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即使川普想對中國發動冷戰，他也已經失去這樣做的能力〉中提到：

美國總統川普在其第一份國情咨文中將中國描述為挑戰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這種觀點與《2018 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相吻合，該文章提到：「現在美國國家安全的最重要問題是國家間的戰略競爭，不是恐怖主義。」。

美國政府在上述報告的官方聲明將中國及俄羅斯形容為挑戰自身國家價值觀、繁榮以及安全的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國際的政治受到美國對中策略的影響，也讓人矚目中美是否會陷入新一輪的冷戰(閻學通，2018 年)。在過去的冷戰期間，今天的中美競爭與美蘇競爭之間存在三個根本區別：

(一)現在中美都在努力防止在國際的責任上承擔太多

如同前文所述，川普執政下認為美國領導全世界並非是美國的重要利益，反而是一種負擔，而為了減輕負擔，在這種「美國優先」的政策導向之下，反

倒要求盟友共同來負擔相關的軍事佈署支出。而在中國方面，中國當局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將會因為領導全世界而有所趨緩，其所付出的成本無法得到同等的效益。

(二) 為避免競爭加劇，演變為意識形態的衝突，中美雙方都針對競爭範圍的畫設界限

川普表示，他無意與中國競爭意識形態。這反映於《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中：「我們不會將自己的生活形式強加於別人。」與美國的態度類似，中國政府也表示：「中國不要求別的國家效仿中國之行為方法。」若是中美兩國沒有把其意識形態提升作為重中之重，相較於冷戰期間美蘇的對抗，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不會如此的激烈。

(三) 與美國和平的競爭是中國當前戰略

當前，中國的軍事能力依舊無法達到美國的水平且相距甚遠，且經濟能力仍是中國國力的最主要構成要素。也因為中國沒有與俄羅斯組成聯盟，世界性的戰爭未發生在前蘇聯與中東的戰爭中，中國也將竭盡全力防止和美國產生各種形式之軍事對抗。

中國在這樣的競爭中相較於美國顯得相當有信心，由於人民對美國政府的不信任，致使川普政府必須面對國內外各種棘手的問題。「戰略信譽」在這場在國際上涉及超級強權之競爭中，成為勝利決定性的關鍵要素。川普政府已然失去獲得這項要素的能力並無法對國際輿論再做形塑。因此，美國已然喪失對中國發動新一波冷戰之能力，即使他想這樣做（閻學通，2018年）。

三、中美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解決之道

在面對習近平針對中美關係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新型大國關係」，閻學通認為中美兩極的局面僅在亞洲地區中形成，在全球的範圍內，中美兩極化的局面尚未形成，僅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如次一來，美國一方面認為中國尚未趕上

美國的實力，故無法與中國處於對等的地位，無法接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這也讓中美在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進程中形成的一大阻礙。(閻學通，2015年)他還提到中國對於建立中美間的新型大國關係應該要持續進行，但有兩件事需要清楚的了解：「一是新型大國關係代表的是新興崛起來國與既有霸權國的關係，僅在這兩者之間為進行全面性的對抗才是新型大國關係，中國在新型大國關係之定義上需與共同來完成，若彼此的概念不一致將無法達成尋求共同安全的結果；二是新型大國關係並非是要打造成過去美國與英國之間的合作戰略關係，而是要避免演變成冷戰時期美蘇軍事對峙的局面，新型大國關係之主要目的為戰略競爭的和平推進，非全面性的合作。」他認為在核子武器及全球化的時代下，中美間是有可能達成以和平的戰略競爭為核心所塑造的新型大國關係。(閻學通，2014年)

2018年人文清華論壇針對中美貿易衝突的議題邀請閻學通進行訪問。他提到，中國不可能有在短期內超過美國的綜合實力。在較長的(15年)時間裡，中國與美國的實力僅是在逼近，但無法超越。因此，中國應該考慮在短期內不會超過美國這一事實來製定政策(陳楚濤，2018年)。他提到以下幾點：

(一)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勝於冷戰

所謂貿易戰，就是貿易衝突比較嚴重，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應該是正常的。他認為不會發生冷戰，因為冷戰的內容和主要形式是代理戰爭，而貿易戰很可能有助於避免冷戰。

(二)能否顧及中國的利益維護才是解決問題的重點，而非運用強勢

脅迫的方法

儘管中美使用關稅相互懲罰，但這種方法表明，雙方都不願使用戰爭來對抗。若非使用軍事相互衝突的方法，而是運用貿易的措施，那應該並非全是壞事。

中國當局保持一直以來的原則，不願和美國兩國間實行貿易的互相制裁，這也是中國至今不斷向美國表明的態度，期望透過和平談判來解決問題。即中國不想要彼此透過貿易報復的方式來確定最終的勝利，中國願意通過談判解決爭端。

(三)不要讓貿易衝突超越貿易邊界

貿易衝突的最佳經驗是將衝突維持在貿易的界線內。由於這是貿易衝突，因此應將衝突置於貿易領域之內，並防止其超出貿易範疇。

閻學通認為，中國的崛起主要取決於中國發展的內在動力，中國能否強大取決於國內發展，如果中國內部不發展，不需要外部遏制，它肯定會衰落。除了中國自身的經濟實力成長速度趨緩的根本性問題外，沒有外在的力量可以避免中國成長壯大(陳楚濤，2018年)。

第三節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金燦榮的觀點

金燦榮是「中國人民大學」對外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學院的副院長、教授及博士生導師，主張國際現實主義及歷史唯物論，為中國官方美國問題的諮詢專家，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戰略與外交、中美關係、大國關係及美國政治，在2018年享有中國國務院特殊津貼並兼任中國商務部經濟外交專家組成員、中央組織部諮詢專家、中央統戰部部聘專家、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諮詢專家、科技部諮詢專家、外交部公共外交諮詢專家、國家海洋事業發展高級諮詢委員、人民政協論壇特聘教授、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中國太平洋學會副會長、中國未來研究會理事長和黨委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及中國和平與發展中心的特約研究員等職務。他國際關係及戰略相關著作包含《中國學者看大國戰略》、《多邊主義與東亞合作》、《美國20講》、《大危機時代和中國式突圍》、《大國責任》、《中國的未來》、《大國來了》、

《中國智慧：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等，並接受相關訪問、提出評述及論文超過千則。學者金燦榮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如下：

一、中美關係有無可能發展成修昔底德陷阱？

2015 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金燦榮在湖北大學學報的哲學社會科學版中第 42 卷第 3 期《中美關係與「修昔底德陷阱」》提到：

(一)中美關係非常複雜，不能簡單地定義為敵人還是朋友

中美關係的複雜程度比歷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更為複雜，但中美之間也有很多合作，相互依存度很高。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截至 2019 年，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和最大之進口來源就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9 年)。

中美間的民間交流很多，再加上中美雙方的相互投資金額已超越 1000 億美元。不盡如此，中美在國際金融穩定、氣候、經貿、環境保護、能源、核武反擴散和反恐等全球性、區域以及雙邊議題上需要廣泛的合作。若中美政府當局不相互合作，國際上的許多議題將不會有解決的希望；相反，中美之間合作，幾乎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金燦榮，2015 年)。

和以前修昔底德陷阱不同的是中美兩國之間彼此依存，也就是雙方擴大的經濟依存度和人員相互交流程度。即便摩擦及對抗始終存在於中美關係當中，兩者關係已然進入了修昔底德陷阱，長期處於緊繃狀態(金燦榮，2015 年)。

(二)中美已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在蘇聯解體後，中國則基於經濟的改革開放即進入 WTO 後，是世界上經濟成長最迅速的新興崛起大國；唯一的超級強權美國則是當前世界的既有霸權國家。中國崛起最具代表性的是 2010 年。在這一年中國之國內生產總值在市場匯率方面已經超過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不僅如此，當年度中國的總發電量及製造業生產總額也變成世界第一，超越了美國。金燦榮教授認為，中國和美國已然在結構上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當中，代表中美關係實際在根本上是相互

抗衡的。中國代表著社會主義，美國代表著資本主義，中美雙方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以及價值觀有著本質上的不一樣，再加上經貿衝突及地緣主權之爭。雙方在的戰略利益上的分歧比過去歷史上的發生修昔底德陷阱的例子還要更加複雜。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國是社會主義大國，尤其是在蘇聯和東歐發生了巨大變化之後。當今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就是中國。這也在意識形態競爭中被看作是美國的首要對手。此外，西方文明的匯聚之地為美國，東方文明的發源地是中國。美國及亞洲文明的文化差異在全球環境變化下更加凸顯出來，雙方文明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因此，中國和美國在結構上正處於修昔底德陷阱當中，且更為複雜(金燦榮，2015年)。

二、分析中美兩國因應修昔底德陷阱的外交戰略變化

(一)美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

美國有史以來首次面對來自新興崛起大國之挑戰。美國的根本價值觀因為中國崛起而受到了挑戰。美國之所以輕忽中國的因素，部分學者提到：首先，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錯誤的指引美國人。其次是在恐怖主義的影響下，它改變了中國作為其主要對手身份的這個判斷。第三為中國的各項數據混雜，並非完全正確，但實際效果卻很好。第四，中國外交戰略延續了過去的領導人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策略。第五，蘇聯瓦解後，美國人過於自傲，他們未察覺到潛藏的危機，認為自身之市場的自由經濟及政治的民主制度就是治理人類的最佳方法。在回顧這些基本的因素後，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在他們看來是一個「心腹之患」，其餘的則是「不足為患」(金燦榮，2015年)。

金燦榮教授提到，在美國提出「重返亞洲」戰略後，中國認為是因為美國緣故才導致中國在南海和東海上出現了各種的爭議事件，除此之外中國對美國的一些做法存在疑義：第一，拉攏新的國家合作關係，例如印度及越南，這對中國而言這些新夥伴似乎都是具有針對性且有爭議的；第二強調聯盟制度，聲稱要改善美國盟國的地位，例如韓國，日本，北美，澳洲，菲律賓和其他盟國；

第三，強調軍事佈署的改變，並宣布將六成之海軍和空軍將轉移到亞洲（金燦榮，2015年）。

(二) 中國推動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時任國務委員的戴秉國在2010年的中美經濟與戰略第2輪談話中提出了一種新的構想，即「新型大國關係」。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於2012年2月訪問美國，提到中美應盡力在兩國關係的歷史新起點上將雙邊合作夥伴關係塑造為二十一世紀之新型大國關係，主張於中美之間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接著在2013年6月，在加州莊園習近平與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舉行了第一次會晤，對新型大國關係的含義進行規範，就是：「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金燦榮教授認為，習近平在中美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構想雖然在政策的實際執行仍有待考驗，但概念正確且極具新意（金燦榮，2015年）。

美國沒有否認或欣然接受這種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新型大國關係不是通過言語而是應該藉由行動來定義」。事實上，美國並非強調架構和原則，而是要實際的發展合作。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抱持更加清晰的態度。他認為原因可能如下：首先，美國是受過去習慣影響，美國從來沒有被其他國家主宰其外交思想。其次，美國對具體內容猶豫不決。美國認為，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是個陷阱，中國之核心利益希望利用美國的身份地位來認證。因此，美國在中國做出相當明確的定義之前，不願做出積極回應。（金燦榮，2015年）。

三、中美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解決之道

歷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與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非常不同。儘管它顯然是對抗性和競爭性的，但它也有著極其緊密的合作和依賴性，因此它為中美之間脫離修昔底德陷阱給予選擇的空間。

(一) 中美不要直接衝突，務必維持最後底線

由於中美這兩個國家在經濟和政治的世界舞台上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兩國彼此間「相互確保經濟毀滅」未來發展也取決於中美關係的定調是緩和或緊張，這在將來影響著全球世界各國的和平及發展(金燦榮，2015年)。

(二)開展雙邊、區域和全球合作

美國進行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首要項目就是要務實的合作。就當前形勢而言，中美需要分別做兩件事：分擔責任和分享權力。就合作方向而言，兩國之間的合作應首先在亞太地區開始進行空間上的合作，即先在中國所處的地區開始合作，然後逐步擴大並擴展到其他地區。兩國要努力加強無關政治議題之全球問題上的合作，取得彼此信任，增進合作默契，然後由非政治性國際問題逐步至低階政治性國際問題並持續發展。這在過去的瀛台峰會會議上雙方領導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金燦榮，2015年)。

(三)中美雙方的歧異與矛盾切實處理

歧異與矛盾在建設新型的大國關係中一定會存在。「主要是如控管好彼此不同的意見，開誠佈公地深刻討論以減少甚至化解分歧。」一旦發生問題可以迅速及時地透過一系列非常具體的交流途徑來進行對應的溝通協調，確保兩國關係健康發展。雙方可以建立一種「功能性夥伴關係」，在中美共同探索出新型大國關係的道路上，中美合作最根本的重點就是將彼此的溝通協調制度化(金燦榮，2015年)。

於瀛台峰會之後，中美達成了兩項軍事共識：其一是相互通報重大軍事行動；其二是若在公海相接，海軍和空軍必須有限制性的行為準則。為避免彼此懷疑與猜忌，伴隨中國的軍事進程現代化加快，兩國需要進行更進一步層次的溝通與協調，否則最終將導致戰略上的錯誤判斷和悲劇(金燦榮，2015年)。

學者金燦榮認為要擺脫修昔底德陷阱，只有通過密切的協調與對話來進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應該加強中美政府之間對話與磋商機制的頻率和深度(金燦榮，2015年)。

第四節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袁鵬的觀點

在 1965 年成立，前身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在當時主要是為中國共產黨官員提供服務，目前直屬於中國國家安全部的事業單位，是中國國際問題方面的綜合性研究中心，在中國的學術界具有高度的影響力，研究結果以研究資料和專題報告的方式提供給中國政府相關部會，或公開學術期刊上發表，提供最直接的智力支持在中國的國家國際事務和外國決策中。「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在 2020 年全球頂級智庫榜單中排名第 18 名(James G. McGann, 2021)它擁有數個研究所，例如俄羅斯研究所及美國研究所等。因其具有前瞻的戰略意識而較受到中國國內外的矚目，是中國最著名的國際研究機構，在中國也被稱作「中國的蘭德公司」。

袁鵬為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同時是博士生導師及研究員，享有中國國務院特殊津貼，同時兼任中美人民友好協會等多家機構理事、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理事、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中華美國學會常務理事、《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新華社特聘專家、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學術委員及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職稱評定委員會所外專家。為中國「四個一批」和「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的人選及中國中宣部文化名家。對於美國問題有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安全與戰略、中美關係、中美外交、亞太地區安全問題等。在中國國際關係的權威性刊物中，如《現代國際關係》、《環球時報》及《人民日報》等發表過眾多有關中美關係的評論及文章，也出版了《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及《中美戰略關係新論》等多項論述中美關係相關著作。針對修昔底德陷阱，袁鵬他有以下的看法：

一、中美關係有無可能發展成修昔底德陷阱？

袁鵬提到 Allison 在他的著作《注定一戰？中美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所提到歷史上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 16 個案例是拼湊出來的，他認為案例並不夠全面及充分，且在全球也有新的案例發生，袁鵬認為 Allison 主要是提供了一個探討思考美中關係的模式，他並不認為中美已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因為若是中美已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就沒有之後談論貿易協議的必要了，中美雙方領導層不僅是在視訊以及電話通訊方面仍然有聯繫，這證明了雙方還是希望可以和平發展中美關係，維持彼此的穩定(袁鵬，2019 年)。

二、分析中美兩國因應修昔底德陷阱的外交戰略變化

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後，2015 年中國成立了亞投行，中國加強與歐洲地區的連結，雖然經濟成長趨緩，但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則不斷上升，袁鵬認為世界的局勢正在發生變化，而發生變化的原因在美國的角度看來是因為中國的崛起，中國在國際上所展現強硬的外交模式也是基於中國崛起造成的；就中國的觀點而言，則認為是因為美國對中政策的改變。袁鵬覺得雙方的看法看起來都很有道理，然而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美國對中政策的轉變及過去如「重返亞洲」等轉至加強對亞洲地區的戰略部屬等策略是人為主觀因素產生變化的；相反，中國的崛起是不可抗力的過程，是自然而然呈現出一種結果。(袁鵬，2015 年)

袁鵬提到，是由中國首先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命運共同體及合作共贏等一連串因應世界局勢轉變的應對方法及概念；相反美國對於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態度是消極且複雜的態度，這也是因為美國仍然執著在身為世界霸權的心態不願做出調整，無法正視中國的核心利益，也不想要由中國來主導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袁鵬，2015 年)。

三、修昔底德陷阱的解決之道

2019年中國與全球化論壇主題智庫會議的討論上，袁鵬說道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他論述如下：

(一)探討為何美國要感到恐懼，可能才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重點

袁鵬提到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中，是因為雅典的崛起而讓斯巴達產生恐懼所引發的悲劇，是故崛起以及恐懼是兩者都要存在的，當前世界上國際關係學者大多討論的是中國的崛起，較少有人提及美國的恐懼(Andrew Brown, 2019年)。一旦美國不再感到恐懼，也沒有因此衍生侵略的戰略行動，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將不復存在。

袁鵬認為美國對於中國過度的恐懼，這些恐懼存在於「中國的科技發展及中國製造 2025」、「將中國一帶一路外交政策結合海權論及地緣中心說」、「中國在美留學生視為存有竊取機密技術的意圖」、「認為中國將南海區域軍事化及視其為具有向外擴張的軍事企圖」等，都是美國過度反應的例子。美國把中國要國家富強的發展策略看作是要取代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袁鵬，2019年)。

美國為何會產生恐懼，袁鵬提及主要是有五個原因：

1. 美國與生俱來的憂患及危機意識。
2. 美國不願交出世界主導權的霸權思維。
3. 美國自身國內未有大規模的改革，將問題歸咎於中國因素。
4. 反華意識深植於美國人心中。
5. 對於新世代中國的變化未有深入的瞭解。

面對這些情況美國需降低姿態，強化內部的改革力度，深入研究中國新的轉變並加強中美雙方的交流(袁鵬，2019年)。

(二)解決的辦法

袁鵬認為，面對中美間的修昔底德陷阱，習近平在針對中美關係的新轉變中所提出的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之概念，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讓中美彼此可以在考量未來的二、三十年間中美關係變化的同時，有對應之基本架構，將所有的衝突與競爭囊括在裡頭，避免中美關係一夕崩潰，也讓國際間的各領域學者提供一個新的思考模式。然而在具體實施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實際執行起來很困難，並不是僅僅喊口號這麼容易，美國在面對中國對於網絡議題、雙方軍事議題及朝核議題等重要國際議題所做出的反應，較難以確信中國是真心要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而這對於中國而言，也是面臨兩難的局面(柯春橋、袁鵬、周小寧，2014年，頁10)。

而若要改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處境，在中美建立一個良好的開端，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有下列三個面向需要具體來執行：

1. 絕對要避免在中美之間爆發正面衝突

中美一旦發生正面衝突，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及雙方過去的努力將付諸流水。

2. 思想必須進一步解放

中美雙方在各方面需要更有創新的思維，才能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3. 中美雙方在戰略判斷上需要更加的科學及精細

若是僅單純說美國受到中國的挑戰或者直接認定美國現在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戰略遏制及圍堵，這樣都過於簡化，難以實際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應該要對美國的行動更精細化地去深入思量，不僅要發掘美國與中國競爭的面

向，也要發現美國遏制中國的情形，更要探尋美國與中國合作的層面(柯春橋、袁鵬、周小寧，2014年，頁10)。

袁鵬認為，中美關係未來的希望就是要堅守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是破解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正確且唯一的方法(袁鵬，2015年)。

第五節 小結

一、「中國學界」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個別觀點

本章節主要是透過「中國學界」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著名學者對於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進行彙整及分析，分別採用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王緝思、「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閻學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金燦榮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袁鵬等4名在中國國內權威性的學者，其中，針對上述各個學者的主要觀點，彙整如下：

(一)「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王緝思

1. 中美關係從過去的合作競爭演變成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對手，並對中國的內政及外交進行全面壓迫，這現象可能已經無法逆轉。
2. 致使中美陷入混亂的原因是因為兩者的「價值觀衝突」及「實力競爭」所造成的。
3. 美國對中政策發生了根本上的「質變」，而美國對中政策轉變的原因有四個面向：
 - (1) 爭奪國家的權力地位。
 - (2) 價值觀與制度的競爭。

(3) 利益的競爭。

(4) 美國政治的競爭。

4. 除了國家重要利益外，若中美兩國間的衝突擴大，很有機會是因為兩國的價值觀產生了衝突。

5. 為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兩國應該針對兩部分做加強：對於雙方共同利益的維護、改善彼此在政治體制及價值觀與日俱增的歧異。

6. 與美國戰略對抗並非有利於中國長期的國家利益，應主動釋出善意建立信任。

7. 維持中國經濟成長的高水準及讓中國國內民眾對生活感到滿意，才是中美關係穩定及解決貿易衝突的最佳戰略。

(二)「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閻學通

1. 中美之間不會有發生戰爭的危險，原因有三：

(1) 核武器的存在。

(2) 全球化的發展。

(3) 中美雙方皆不願承擔更多國際責任。

2. 中國軍事能力依舊與美國的水平相距甚遠，與美國和平競爭是中國當前戰略。

3.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雙方政策制定方向：

中美間發生貿易衝突有助於避免冷戰、將衝突劃設界線維持在貿易的領域內、顧及中國的利益維護而非強暴脅迫的方法。

4. 除了中國自身經濟實力成長趨緩的根本性問題外，沒有外在的力量可以避免中國成長壯大。

(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金燦榮

1. 中美關係在結構上已經進入修昔底德陷阱，根本上是相互抗衡的，長期處於緊繃狀態。
2. 與過去修昔底德陷阱不同的是中美兩國相互依存，及雙方經濟依存度及人員交流程度的擴大。
3. 中美雙方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文明及價值觀有本質上的不同，再加上經貿衝突及地緣主權之爭，雙方在戰略利益上之分歧比過去歷史上發生的修昔底德陷阱例子要更加複雜。
4. 修昔底德陷阱的解決方法：
 - (1) 中美不能直接衝突，必須維持最後底線
「相互確保經濟毀滅」關係著中美與世界的和平及發展。
 - (2) 開展雙邊、區域和全球合作
分擔責任、分享權力、務實合作。
 - (3) 中美雙方的歧異與矛盾切實處理
控管好彼此不同的意見，公開及密切地深入討論以化解分歧，將雙方的溝通協調制度化。

(四)「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袁鵬

1. 不認為中美已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2. 世界的局勢正在變化，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不可抗力的自然現象，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改變則否。
3. 一旦美國不再感到恐懼，也沒有因為恐懼而產生侵略性的戰略行動，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將不復存在。
4. 美國對於中國要國家富強的發展策略反應過度，當作是要取代美國之霸主地位。
5. 改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三個具體面向：
 - (1) 中美雙方避免發生正面衝突。
 - (2) 在各方面要有更創新的思維。
 - (3) 雙方的在戰略判斷上要更加謹慎，即要涵蓋競爭、遏制及合作等面向。

二、「中國學界」對於修昔底德陷阱在看法上之相同之處

綜上所述，在深入研究上述四名中國學界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後，可以發現出他們之間的幾個共識如下：

- (一) 權力的競爭及利益的爭奪是中美雙方發生衝突的關鍵，惟均強調中國是為了國內人民生活富足和平發展並非要與美國在世界競逐霸主地位，企圖降低美國因中國崛起而產生的恐懼，
- (二) 均同意中美兩國在價值觀、政治體制、文化、意識形態及文明上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這也是中美間若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
- (三) 當前中國的戰略是絕不能和美國發生正面衝突，均認知到中國自身的軍事能力尚與美國相距甚遠。

(四) 均認為當今的中美關係與過往歷史上修昔底德陷阱例子的情況不同且更加複雜，原因包括現今中美雖然對抗但雙方人員往來互動交流密切，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度高等。

(五) 均推崇當代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所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解決當前中美關係困境及避免雙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之一。

(六) 均認同是否能繼續維持中國經濟的高度成長是中國為來能否與美國抗衡的重要關鍵。

在針對「中國學界」四位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對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進行彙整後，在下個章節與「中國官方」的看法進行比較，尋找中國學界與中國官方的共通之處，並分析他們的論述是傾向樂觀或者悲觀，以及與中國政府當局政策的關聯性。



表 4-1 「中國學界」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個別看法、相同與不同之處

機構	北京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	清華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院	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 研究院
代表學者	王緝思	閻學通	金燦榮	袁鵬
中美關係有無可能發展成修昔底德陷阱？	「價值觀衝突」及「實力競爭」造成中美陷入了混亂。	因為核武的存在，與過去歷史上其他新興大國相比，即使中美雙方關係為結構性零和遊戲，中國面臨『最少的』戰爭威脅。	1. 中美關係在結構上已經進入修昔底德陷阱，根本上是相互抗衡的，長期處於緊繃狀態。 2. 與過去修昔底德陷阱不同的是中美兩國相互依存，及雙方經濟依存度及人員交流程度的擴大。	一旦美國不再感到恐懼，也沒有因為恐懼而產生侵略性的戰略行動，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將不復存在。
分析中美兩國因應修昔底德陷阱的外交戰略變化	與美國戰略對抗並非有利於中國長期的國家利益，應主動釋出善意建立信任。	中國軍事能力依舊與美國的水平向距甚遠，與美國和平競爭是中國當前戰略。	中國推動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中國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命運共同體及合作共贏等一連串因應世界局勢轉變的應對方法及概念。
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解決之道	1. 對於雙方共同利益的維護、改善彼此在政治體制及價值觀與日俱增的歧異。 2. 維持中國經濟成長的高水準及讓中國國內民眾對生	1. 中美間發生貿易衝突有助於避免冷戰。 2. 將衝突劃設界線維持在貿易的領域內、顧及中國的利益維護而非強暴脅迫的方	1. 中美不能直接衝突，必須維持最後底線。 2. 開展雙邊、區域和全球合作。 3. 中美雙方的歧異與矛盾切	1. 中美雙方避免發生正面衝突。 2. 在各方面要有更創新的思維。 3. 雙方的在戰略判斷上要更

	活感到滿意，才是中美關係穩定及解決貿易衝突的最佳戰略。	法。	實處理。	加謹慎，即要涵蓋競爭、遏制及合作等面向。
四者相同之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強調中國不會尋求稱霸。 2. 中美雙方文化、價值觀、政治體制及意識型態有本質上的不同。 3. 中美雙方軍事實力相差甚遠，中國仍無法與美國抗衡。 4. 當今的中美關係不同於過去歷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 5. 認同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作為避免雙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之一。 6. 維持經濟的高度成長是未來中國能與美國抗衡的關鍵。 			
四者不同之處	美國對中政策發生了根本上的「質變」。	中美之間不會有發生戰爭的危險。	中美關係非常複雜，不能簡單地定義為敵人還是朋友。	不認為中美已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五章 結論

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對於中國而言，不論他們的看法是認為中美關係現在是否已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然而兩國關係因為相互競爭而演變為古希臘的雅典與斯巴達間修昔底德陷阱的處境之可能性仍然不容忽視，一旦中美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對於兩國本身乃至全世界的國際情勢都會產生巨大的轉變。本論文發現「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在如何看待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態度是其在決定外交戰略的關鍵。有鑑於此，透過蒐集「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對於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維意涵，再加以分析及彙整「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在觀點上之共通點，歸納出中國本身在看待修昔底德陷阱的一個邏輯架構。依據這個架構，本論文再加以深入探究後，評估出中國當前及未來可能會採取的戰略行動及要傳遞給美國乃至世界的意圖。

本章節主要是分為三節。第一節在綜整出「中國官方」與「中國學界」的觀點後，試圖比較他們在看待修昔底德陷阱在整體上論述之共通點及不同之處。第二節本論文透過各章節所得出的研究發現，總結出中國未來可能的作為及對世界的宣示。第三節則依據本論文之研究結果，對於未來「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在看待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見解提出後續研究建議，並針對中美關係以及全世界的未來展望及前景進行論述。

第一節 「中國官方」與「中國學界」在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各個面向之態度有何異同？

一、「中國官方」與「中國學界」在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看法上相同之處

「中國官方」以及「中國學界」對於中美間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別於西方國家之看法。和西方學者相比，中國學者所採用之論點與中國政府所採取的官方政策和態度是較為相近的，而中國學者及其政府官員在以下方面對修昔底德陷阱抱持相似之方向：

(一) 中美關係比過去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更為複雜

無論是「中國官方」或者「中國學界」，他們都提到，當前中美關係的局勢要比過去古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這兩個大國更為複雜，主要差異是中美之間的現狀。無論是貿易、金融、人員流動甚至是各種全球性問題，兩者都幾乎交織在一起。金燦榮教授也說道，中美之間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存在許多問題但也有許多合作領域。這使中美關係無法簡單地將兩者定義為敵人或朋友。中美關係在未來是開放的，有很多的可能性。

(二) 修昔底德陷阱是有辦法破解的

基本上，不論是「中國官方」以及「中國學界」對於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態度都是較為「樂觀」的，他們在這項議題上能提出相對的解決辦法或者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方式，一如學者閻學通在 2016 年 8 月的文章裡說道：

「在國際關係理論上，修昔底德陷阱實際上相當於當今於中國和美國之間存在的『安全困境』。在當今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矛盾』也就是『安全困境』之所在。從理論上來說，戰爭衝突、安全困境、零和博弈和結構性矛盾相互間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不僅僅只有戰爭這一種化解結構性矛盾之方式。而且零和遊戲及雙方正面的衝突都是中美有辦法找到其他方式來取代的。」(閻學通，2016 年)

(三) 中美關係發展之新構想為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面對中國的崛起，與美國更為原始本能和現實的反應相比，「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較能認同中國政府倡導於中美之間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之主張。提到了避免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的新思路。一方面也是因為這是由中國所新建構的中美關係模型，然而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在付諸到實際執行上，就如同中國學者金燦榮所說的：「很難清楚補充新型大國關係的內容。這主要是實踐的問題，而不是理論問題，在實施到具體政策上仍然存在一些障礙。」(金燦榮，2015年)

(四)認識目前與美國的整體實力之間仍然存在差距，減少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的可能性

「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都非常了解中國自身的綜合實力與美國之間的差距，也都能體認到和美國直接發生衝突並非當前對中國有利的國家戰略，重點乃是在於維護中國內部穩定和持續經濟的發展。在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採用了「戰狼式」的反擊方法。一些中國人包括退休之外交學者或外交官對此提倡中國的外交應重歸鄧小平之「韜光養晦」。儘管中國受到極「左」的極端勢力影響，但大體上仍持續過去自身經驗繼續深化改革及擴大開放。這在學者閻學通的論述中有提到：「儘管中國的核武和軍事力量仍遜於美國，但外界入侵中國的戰爭危險越來越小。在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過程中，中國的外交戰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務必優先提高其「國際戰略信譽」，此乃當前最重要之國家利益。」(閻學通，2016年)

二、「中國官方」與「中國學界」在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看法上不同之處

「中國官方」與「中國學界」對於修昔底德陷阱在看法上大致相近，兩者的大方向均相同，惟「中國學界」相較於「中國官方」處於政策的實際執行層

面，會對於中國當局未來可能實施的政策走向有更多詳細的解釋及建議的執行方式，並對中國當局的正在進行的戰略做深入分析及闡述，也可以說「中國官方」的看法就是一篇文章的大綱，「中國學界」則是大綱內撰寫的內容。

表 5-1 「中國官方」與「中國學界」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相同與不同之處

機構	中國官方	中國學界
看法相同之處	1. 中美關係比過去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更為複雜。 2. 修昔底德陷阱是有辦法破解的。 3. 中美關係發展之新構想為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4. 認識目前與美國的整體實力之間仍然存在差距，減少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的可能性。	
看法不同之處	「中國官方」與「中國學界」對於修昔底德陷阱在看法上大致相近，兩者的大方向均相同，可以說「中國官方」的看法就是一篇文章的大綱，「中國學界」則是大綱內撰寫的內容。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研究發現

經過彙整相關文獻過後，不論是在中國官方或中國學者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中，他們所抱持的態度及方向大致都相同，而其中他們當前及未來可能採取的外交戰略及要傳達給美國甚至全世界的訊息及潛在意圖，本論文彙整出下列幾項觀點：

- 一、強調中國與各國尤其是美國要一同齊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發生，將世界焦點轉移到中美及世界必須一同合作解決的國際議題。

- 二、對外時刻宣稱中國自身不會稱霸的特性，降低美國對於相對權力被剝奪的恐懼感。
- 三、向世界散佈和平友好的訊息，藉以安定周邊鄰近國家以及在崛起過程中可能受到威脅的國家。
- 四、認識到中國自身的軍力上無法與美國抗衡，為避免受到美國矚目及主動攻擊，仍想保持低調的成長，與美國戰略對抗並非有利於中國的長期利益。
- 五、維持高度經濟成長是中國未來與美國抗衡的最重要籌碼及安定中國共產黨在其國內政權的首要任務。
- 六、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新理論架構，企圖改變中美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維。

在本論文中可以發現「中國學界」對於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在本質上是以「中國官方」的觀點作為大方向，再從中做出相對應的研究及解釋進行深入探討及擴充，較少會有與中國官方觀點完全相反的論述或是看法差異極大的情況，有鑑於此，預測中國未來可能的對美政策及分析中國當前戰略意圖可以藉由「中國學界」來著手，與「中國官方」的觀點進行比較，尋找兩者的共通性確定中國所欲對外表達的戰略意圖及其潛在之目的，以正確判斷中國的真實意涵，減少中美雙方因戰略誤判而造成悲劇的可能性。

當前，中美面臨的基本難題之一，是中美關係間的戰略地緣政治力量長期處於劇烈的競爭關係之中。在久遠的古希臘各個崛起國家中談論「修昔底德陷阱」，既有霸權國家與新興崛起國家需要更多的交流。與此同時，中國正試圖使中華民族的復興再次重現，在這個進程，美國依然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基於這一現實，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定義中美關係的核心所在，中美如何共處這

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中美需要共同生活，來取代彼此相互毀滅，沒有人會成為戰爭的勝利者。(Graham Allison, 2021)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與中美的未來展望

一、 後續研究建議

本論文的研究期間是在現任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前，範圍主要是針對於美國川普政府及中國習近平政權領導下的雙方情勢及政策之於修昔底德陷阱之立論進行分析，惟 2021 年美國拜登總統上任後，美國所執行的政治決策及對中外交模式必定會有所改變，然而雙方在面臨中美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依舊是存在的，未來隨著時空環境背景的演變仍然可能發生衝突，有關後續研究建議筆者認為可以針對美國拜登政府的對中政策的執行及習近平如何做出回應進行探討，並試圖藉由「中國官方」及「中國學界」的觀點分析潛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進而評估發生戰爭的可能，並可試圖比較與川普執政時期中美雙方關係的轉變下他們對於中美間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有何變化。再者全球在面對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肆虐又或者其他突發事件的情況下，「中國官方」或「中國學界」對於中美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是否會因而有所改變，建議可做為未來後續的研究方向。

二、 中美的未來展望

全世界當前在 COVID-19 肺炎病毒的肆虐之下，中美之間雙方的權力競逐依舊如火如荼的進行，兩國間在國際上的疫苗捐贈及分派也被視為雙方戰略部屬的重要一環及中國也藉由這個機會在被視為美國後院的中南美洲給予醫療的資源及疫苗上的援助，頻頻向這個地區的國家釋出友好的一面，這些舉動也讓美國提高警惕，認為中國此舉是在藉機拉攏美國的同盟，衍然成為「中美

疫苗戰」的新戰區。不僅如此，中國的實力突飛猛進的同時，在其後印度的國家實力成長速度也不妨多讓，在經濟增長與人口結構都與中國相近，但其與中國不同，和美國的關係仍算是友好，亦可作為中美雙方在國際間相處模式之參考。當今世界的局勢越趨複雜，世界各國若要維持世界和平需要花費更多的心力，包括美國及中國在內各個國家若要戰爭不再發生，就要有不能將戰爭視為可以執行之選項的共識，各自做出適當的政策調整，攜手共創和平繁榮。

中國的實力不斷與美國拉近差距，目前這個趨勢尚未有改變的跡象，然而中美雙方的權力變化是漸進式的，短時間內較難有大幅度的突破，習近平維持著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變，美國若是仍然延續川普執政時期的美國優先的政策，雙方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及利益必然會有所衝突，權力必定會相互競合，端看中美彼此的對於自身在國際定位的態度如何調整，在面對分歧時兩國如何有智慧地遠離戰爭的發生性，破解修昔底德陷阱，若未來既有霸權國家與新興崛起大國間權力均能和平地轉移，大規模戰爭不再發生，亦是全人類之幸。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吳玉山，2011〈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收錄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

閻學通，1998。《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專書譯著

David P.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son 著，高一中譯，2016。《廿一世紀的美國與中共權力轉移想定》(*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臺北市：國防部政務辦公室。

Graham Allison 著，包淳亮譯，2020。《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新北市：八旗文化。

Graham Allison 著，林添貴譯，2013。《去問李光耀》(*LEE KUAN YEW –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臺北市：時報文化。

John Mearsheimer 著，唐小松、王義桅譯，2014，《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臺北市：麥田，城邦文化出版，一版。

Ronald L. Tammen, Douglas Lemke,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Jacek Kugler, Allan C. Stam III, Mark Andrew Abdollahian, A.F.K. Organski 著，向駿譯，2003，《權力轉移：廿一世紀的戰略》(*Power Transitions*)，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Samuel P.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2020。《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新北市：聯經。

Thucydides 著，謝德風譯，2000。《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新北市：臺灣商務。

期刊論文

何新華，2004/11。〈「天下觀」：一種建構世界秩序的區域性經驗〉，《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 32 期。

金燦榮，2015/5。〈中美關係與「修昔底德陷阱」〉，《湖北大學學報》，第 42 卷第 3 期，頁 13-19。

柯春橋、袁鵬、周小寧，2014/7。〈「修昔底德陷阱」：歷史與現實〉，《軍事歷史》，第 198 卷第 3 期，頁 5-12。

陳村富，2020/7。〈古希臘有過「修昔底德陷阱」嗎？—艾利森教授造假背後之「圈套」〉，《南國學術》，第 10 卷第 3 期，頁 356-363。

楊泰順，2018/3。〈川普首次國情咨文內容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3 期，頁 32-41。

薛健吾，2020/4。〈中國「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的進展與影響(2013-2018)〉，《遠景基金會季刊第二十一卷第二期》

網際網路

大學生必備網，2020/5/25。〈2020 國際關係學院排名〉，大學生必備網，
<<https://www.dxsbb.com/news/70561.html>>

毛澤東，1938/11/6。〈戰爭和戰略的問題〉，《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81106.htm>>

牛鏞、胡永秋，2021/4/24。〈王毅：中國的歷史智慧是「國霸必衰」，而不是「國強必霸」〉，《新浪新聞》，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10424/38338930.html>>

中央社，2014/5/21。〈亞信-習近平倡議亞洲新安全觀〉，《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521003268-260409?chdtv>>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12/3。〈學習「習近平關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03/c64387-23722539.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12。《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5-12/22/content_134060.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9。《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摩爾多瓦共和國大使館》，
<http://md.chineseembassy.org/chn/zt_1/zt1/t859938.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9/12。〈2019年12月美國貿易簡訊〉，《國別報告》，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new/view110209.asp?news_id=67874>
- 中國共產黨新聞，1927/8。〈八七會議〉，《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64162/64167/2534109.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7/4/25。〈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人民網》，<
<http://ydyl.people.com.cn/BIG5/n1/2017/0425/c411837-29235511.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2016/1/1。〈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01/c_1117646695.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2018/4/4。〈中國人民共和國解放軍內務條令〉，《維基文庫》，<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5%86%85%E5%8A%A1%E6%9D%A1%E4%BB%A4>>
- 王楊、張苗鳳，2014/1/24。〈《世界郵報》創刊號：聆聽習近平，聆聽修昔底德的啟迪〉，《觀察者網》，
<https://www.guancha.cn/NiGuLaSi-BoGuRui/2014_01_24_201899.shtml>
- 王緝思，2019年2月14日。〈共同的利益，衝突的價值觀〉，《國際網》
<<http://comment.cfisnet.com/2019/0214/1315211.html>>

- 王緝思，2019年6月13日。〈如何判斷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環球網》
<https://www.sohu.com/a/320194851_162522>
- 王緝思、黃仁偉，2019/6/28。〈中美可能長期對抗，我們該另起爐灶嗎？〉，《觀察者網》，
<https://www.guancha.cn/HuangRenWei/2019_06_29_507488_s.shtml>
- 王緝思，2021/1/19。〈中美關係中的「身分政治」〉，《觀察者網》，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1-19/9390700.shtml>>
- 白羽，2014/5/15。〈習近平：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15/c_1110712406.htm>
- 央視，2014/5/16。〈習近平：中華民族血液中沒有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31/8/9/3/103189380.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3189380&mdate=0516092927>>
- 狄雨霏，2014/10/16。〈「習近平的中國特色：傳統文化與黨文化兼容並濟」〉，《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1016/c16exceptionalism/zh-hant/>>
- 邱立玲，2021/3/9。〈中國兩會：2021年國防預算首突破2千億美元-解放軍將領提「修昔底德陷阱」〉，《信傳媒》，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5%85%A9%E6%9C%83-2021%E5%B9%B4%E5%9C%8B%E9%98%B2%E9%A0%90%E7%AE%97%E9%A6%96%E7%AA%81%E7%A0%B42%E5%8D%83%E5%84%84%E7%BE%8E%E5%85%83-%E8%A7%A3%E6%94%BE%E8%BB%8D%E5%B0%87%E9%A0%98%E6%8F%90-%E4%BF%AE%E6%98%94%E5%BA%95%E5%BE%B7%E9%99%B7%E9%98%B1-092919655.html>>
- 沈旭暉，2015/11/16。〈點評中國：習近平時代中國外交的十大特色〉，《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1/151116_cr_xijiping_diplomacy>

- 金香花，2019/10/28。〈「家國天下」觀念的歷史形成及其現代意義〉，《光明日報》，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9/1028/c40531-31423123.html>>
- 香港文匯報，2003/12/11。〈溫家寶：把目光投向中國〉，《香港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03/12/11/YO0312110004.htm>>
- 姜萍萍、秦華，2014/5/5。〈習近平：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0505/c64094-24973220.html>>
- 范進發，2014/8/12。〈解析中國海軍三大發展階段-航母核潛打造「藍水海軍」〉，《人民網》，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4/0812/c1011-25447731.html>>
- 馬文英，2017/3/21。〈王毅：中美不會走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國日報網英語點津》，
<https://language.chinadaily.com.cn/2017-03/21/content_28626784.htm>
- 高橋哲史，2018/3/6。〈閻學通：中美誰都不想領導世界〉，《日經中文網》，
<
<https://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viewpoint/29476-2018-03-06-05-00-00.html?start=0>>
- 紐約時報，2015/9/24。〈習近平在歡迎宴會上演講全文〉，《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0924/cc24xijinpingspeech/zh-hant/>>
- 孫揚，2013/6/6。〈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由來〉，《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6/06/c_116064614.htm>
- 徐夢溪，2019/7/9。〈樂玉成：中美有足夠智慧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54/7/9/2/105479204.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5479204&mdate=0709002541>>
- 郭偉峰，2018/7/3。〈習近平對「修昔底德陷阱」及「國強必霸」的批判〉，《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51/2/1/3/105121353.html?coluid=245&kindid=14256&docid=105121353>>

郭俊奎，2014/5/16。〈「中華民族美有侵略他人的基因」是和平宣言〉，《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BIG5/n/2014/0516/c241220-25027090.html>>

袁鵬，2015/11/17。〈袁鵬：世界新秩序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中美印象》，<
https://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7092>

袁鵬，2019/5/5。〈袁鵬：「美國的恐懼」源於缺少自身的反思及改革〉，《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s://www.sohu.com/a/311944014_828358>

陳楚瀾，2018/4/2。〈閻學通：中美發生貿易沖突比冷戰好〉，《搜狐》，<
https://www.guancha.cn/YanXueTong/2018_02_10_446566.shtml>

陸穎，2014/10/9。〈習近平外交戰略解讀(一)：亞洲安全觀〉，《中國日報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09/c_1112741316.htm>

常曉宇，2014/10/23。〈美國對「新型大國關係」提法為何不積極？〉，《大公網》，<
<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watch/2014-10/2799687.html>>

曹淼、謝磊，2017/11/24。〈深入認識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的重大意義〉，《學習時報》，<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124/c40531-29665457.html>>

國防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2013/3/17，〈牢牢把握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解放軍報》，<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17/c40531-20817025.html>>

國務院，2014/6/14，〈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畫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6/27/content_8913.htm>

習近平，2013/1/22。〈老虎蒼蠅一起打〉，《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7/0906/c413700-29519563.html>>

- 習近平，2016/9/8。〈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
《國家外匯管理局遼寧省分局》，<
<https://www.safe.gov.cn/big5/big5/www.safe.gov.cn/liaoning/2016/0908/197.html>>
- 習近平，2018/3/20。〈人大閉幕：習近平演講強調「黨領導一切」〉，《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3468026>>
- 習近平，2019/6/15。〈習近平在亞信第五次峰會上的講話〉，《新華社》，
<http://mod.gov.cn/big5/shouye/2019-06/15/content_4843630.htm>
- 裴敏欣，2013/7/8。〈點評中國：中美能建立「新型的大國關係」嗎？〉，《BBC
NEWS 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focus_on_china/2013/07/130708_cr_china_usa_relation>
- 楊開煌，2017/12/23。〈中共從「決不當頭」到不得不領頭〉，《中國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71223000735-262114?chdtv>>
- 新華社，2009/11/27。〈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週年座談會的講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9-11/27/content_1474642.htm>
- 新京報，2013/6/10。〈習近平概括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衝突、不對抗，相互
尊重，合作共贏〉，《中美聚焦 CHINA & US Focus》，<
<http://zh.chinausfocus.com/m/show.php?id=18997>>
- 新華網，2003/11/24。〈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新
浪新聞中心》，<<http://news.sina.com.cn/c/2003-11-24/12541176473s.shtml>>
- 蔣銳，2010/11/15。〈習近平：中國「永遠不稱霸」〉，《BBC NEWS 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0/11/101115_xi_singapore>
- 閻學通，2014/6/26。〈美俄關係與中日關係都不是新型大國關係〉，《人民網》，
<https://www.guancha.cn/YanXueTong/2014_06_26_241158.shtml>

- 閻學通，2015/2/5。〈亞太已形成中美兩極格局〉，《新華網》，<
<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896a4vn.html>>
- 閻學通，2016/8/18。〈用「命運共同體」來破解中美間的「修昔底德陷阱」〉，《觀察者網》，
<https://www.guancha.cn/YanXueTong/2016_08_18_371716.shtml?web>
- 閻學通，2016/7/28。〈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與戰略選擇〉，《世界和平論壇平台》，<
<https://giis.gdufs.edu.cn/info/1307/5628.htm>>
- 閻學通，2018/2/10。〈即使川普想對中國發動冷戰，他也已經失去這樣做的能力〉，《世界和平論壇平台》，<
https://www.guancha.cn/YanXueTong/2018_02_10_446566.shtml>
- 燕磊，2013/11/3。〈習近平：改善民生是第一要務不走國強必霸道路〉，《新京報》，<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1-03/5456642.shtml>>
- 謝金河，2010/9/2。〈「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那頂桂冠——中國與日本的新定位〉，《今周刊》，715期，
<<https://www.businessday.com.tw/article/category/154685/post/201009020029/%E3%80%8C%E4%B8%96%E7%95%8C%E7%AC%AC%E4%BA%8C%E5%A4%A7%E7%B6%93%E6%BF%9F%E9%AB%94%E3%80%8D%E7%9A%84%E9%82%A3%E9%A0%82%E6%A1%82%E5%86%A0%E2%80%94%E2%80%94%E4%B8%AD%E5%9C%8B%E8%88%87%E6%97%A5%E6%9C%AC%E7%9A%84%E6%96%B0%E5%AE%9A%E4%BD%8D>>
- 薛濤，2015/8/8。〈習近平：中國不認同「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人民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08/c_128106702.htm>
- 藍孝威，2021/4/18。〈樂玉成：我們不認為國強必霸 但堅信國霸必衰〉，《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418002472-260409?chdtv>>
- Alex Chang，2015/8/26。〈透視中國：一廂情願的「新型大國關係」〉，《BBC NEWS 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8/150826_focusonchina_us_china_new_relations>

Andrew Brown, 2019/5/23。〈中國與全球化論壇圓桌紀要：要逃離「修昔底德陷阱」，不如研究美國為何恐懼〉，《觀察者網》，<
https://www.guancha.cn/AndrewBrowne/2019_05_23_502771_s.shtml>

Cristina Burack, 2020/10/25。〈美國大選：川普如何改變全球外交政策〉，《德國之聲中文網》，
<<https://www.dw.com/zh/%E7%BE%8E%E5%9B%BD%E5%A4%A7%E9%80%89%E7%89%B9%E6%9C%97%E6%99%AE%E5%A6%82%E4%BD%95%E6%94%B9%E5%8F%98%E5%85%A8%E7%90%83%E5%A4%96%E4%BA%A4%E6%94%BF%E7%AD%96/a-55390261?zhongwen=trad&maca=chi-VAS-VT-BusinessWeekly-Lang-30499-xml-media>>

Graham Allison, 2021/3/16。〈如何看中美關係？“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如是說〉，《新浪新聞》，<
<https://news.sina.cn/gn/2021-03-16/detail-ikkntiam3060095.d.html>>

英文部分

專書

G. Lowes Dickinson, 1916. *The European Anarchy*, New York: Macmillan.

Henry Kissinger, 2014.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

Inis L. Claude, Jr., 1962.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

Inis L. Claude, Jr., 1988. *Sword into Plowshares: the Problem and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th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Jack S. Levy, 1983.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1975*,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Jack S. Levy, 2004.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in T.V. Paul, et. Al. eds., *Balance of Power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 J. Mearsheimer,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John J. Mearsheimer , 2014.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pdated Edition.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Morgenthau H., 1985.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Robert Blackwill and Jennifer Harris, 2016,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官方文件

United States,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期刊論文

Aaron L. Friedberg, 1994/ Spring.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9, pp. 20-21.

Aaron L. Friedberg, 1993/ Winter. “Ripe for Rival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pp. 20-21.

Ernst B. Haas, July 1953. “The Balance of Power: Prescription, Concept, or Propaganda?” *World Politics* 5, No. 4 , pp. 442-447.

Joseph S. Nye, Jr., 1990/ Summe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pp. 181-182.

Jonathan Kirshner, 2019. “ Handle Him with Care: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Thucydides Right,” *Security Studies*, Vol. 28, No. 1, pp. 1-24.

John K. Fairbank, 1969.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47, No. 3.

Munro, Ross H., 1992/ Fall.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Vol. 62, pp. 10-16.

Paul Schroeder, 1994/ Summ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pp. 148.

Samuel P. Huntington.,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pp. 22-49.

Barack Obama, 2011/11/17,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http://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Graham Allison, 2015/9/24.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Hillary Clinton, 2011/1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

James G. McGann, 2021/1/28.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larlyCommons, <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9&context=think_tanks>

